

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

張淑雅

摘要

「反攻大陸」是中華民國政府（簡稱國府）遷臺後念茲在茲的目標，也是國府在臺灣的基本國策。冷戰高峰期間，支持國府、不承認中共的美國，對國府這個基本政策的立場究竟為何？本文仔細分析美國在 1950 年代兩次臺海危機期間對「反攻大陸」政策所做的深入思考，並指出：美國從未打算支持國府反攻，但爲了牽制中共，一直不願公開反對此政策。至 1954-1955 年第一次臺海危機期間，由於擔心國府趁機擴大衝突，美國才開始仔細思考有關反攻的問題，結果是要求國府不可憑武力硬性反攻，而是要「待機反攻」，也就是將自己塑造成一股可以隨時出動的力量，等局勢有利時把握機會取代中共。第二次臺海危機爆發後，美國將「待機反攻」的想法進一步推演，構思了讓「反攻大陸」精神化的說詞，要國府扮演中國文化的守衛者，以爭取大陸民心，作爲日後重掌政權的基礎。由於國府早就聲明反攻革命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也一向以爭取大陸民心爲要務，故蔣介石在危機末期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發表聯合公報，聲明反攻主要途徑「爲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美國的說詞或許並未立即改變國府有關反攻大陸政策的實質，但徵諸 1960 年代中期後，國府大力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口號，美國的想法對國府應有相當長遠的影響。

關鍵詞：臺海危機、八二三砲戰、反攻大陸、杜勒斯、蔣介石

The Taiwan Strait Crises and U.S. Attitude toward ‘Reconquering the Mainland’ in the 1950s

Su-Ya Chang

Abstract

Ever since its retreat to Taiwan,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GRC) was to “Return to the Mainland” or to “Reconquer the Mainl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 sponsor of the NGRC in the 1950s, never intended to help the aging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in fulfilling his “dream.” Washington, however, maintained public ambiguity over such slogans in the hope they would help to contain the “Red Chinese”. Such a deliberate ambiguity was challenged when the Communists launched the first shelling campaign against Quemoy in September 1954. Through this and then the next Taiwan Strait crisis in 1958, Washington was forced to think hard about the “Reconquering the Mainland” slogan. It first decided to advice Taipei to prepare itself as “a force of opportunity” ready to take over the mainland when circumstances became favorable, rather than planning on retaking the mainland by force. Then, in 1958, Washington depicted a new role for the Nationalists—to be the “custodia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values,” so that it could appeal to the Chinese people when the

Communist regime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Since Chiang Kai-shek had been stressing that the task of reconquering the mainland relied mainly on political, rather than military, means, he agreed to reiterate it in a joint communiqué with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In that pronouncement, it was said that the principle means of successfully liberating the Chinese people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Dr. Sun Yat-sen’s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not the use of force.” Judging from the enormous efforts by the NGRC in promoting the “Resto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ince the mid-1960s and the “Reunification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since the 1970s, Washington’s design perhaps had a lasting impact over the essence of the NGRC’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Mainland.”

Key words: Taiwan Strait Crisis, Reconquer the Mainland, Return to the Mainland, John Foster Dulles, Chiang Kai-shek

臺海危機與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轉變

張淑雅*

- 一、前言
- 二、九三砲戰前美國對「反攻大陸」的政策
- 三、第一次臺海危機與「反攻大陸」
- 四、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
- 五、結論

一、前言

1950 年代出生的我，在「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的歌聲與以「解救大陸同胞」為最崇高目標的教育系統下長大，記憶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確實以「解救大陸同胞」為自己與國家民族的「神聖的使命」。年紀稍長後，才知道小學作文中所寫的遠大志向，原來叫做「反共八股」，只是個口號、不能當真。到了「變天」的二十一世紀，這個 1950 到 1960 年代人人朗朗上口的口號，看起來只像老掉牙的笑話，是蔣家政權「外來統治者」的一場「癡人說夢」。當然今天臺灣企業界普遍熱衷大陸投資，尤其「戒急用忍」鬆綁後，大企業「登陸」或「計畫登陸」更是時有所聞，大陸變成臺灣「移民」的第二選擇，臺灣人赴大陸置產、佔地盤的現象也數見不鮮，或許可以解嘲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為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一九五〇年代中美關係之探討 2/5 & 3/5」(NSC 89-2411-H-001-011 及 NSC 89-2411-H-001-017)的研究成果。在此感謝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先生、趙綺娜小姐與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初稿的指正。

說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反攻大陸」。¹不過既然研究那個時代的歷史，對這個當年是臺灣許多人生活的目標，也陪伴著童年的我成長、甚至是一時志向的口號，難免想了解其背後的內涵。

在國外史家的眼裡，蔣介石既然「敗者為寇」，他在臺灣的作為都沒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何況他這個自欺欺人的「反攻」白日夢。因此除了批判蔣不斷地利用各種機會煽動美國支持他攻擊大陸，以便重獲政權外，國外史家很少深入探討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的反攻政策與準備。而國府既未發動反攻行動，美國的對策，以及美方的態度與行動在國府反攻計畫內所扮演的角色，也就連帶沒有討論的必要。²大陸近期出版品對蔣介石與國府「反攻大陸」並打算將其他國家牽扯入內的「密謀」，雖然著墨較多，但多為批判、嘲弄的通俗作品，較少嚴謹的歷史研究成果。³國內雖然到1980年代為止，關於「反攻大陸」、「光復大陸」或「反共復國」的言論還充斥著許多官方與非官方的出版品，⁴但對於「反攻大陸」政策本身或此政策與美國關係的歷史研究，卻如鳳毛麟角。

以「反攻大陸」為主題的歷史研究，至今僅見任教於英國牛津大學、原籍香港的曾銳生所作的“Chiang Kai-shek and the Kuo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一篇。⁵該文雖然以國府的反攻

¹ 戲查《聯合知識庫》網站(www.udndata.com)，可以發現「反攻大陸」在1990年代末期以後，成為工商業、影劇、藝文界等到大陸開拓市場或舞臺的代名詞，「反攻大陸」在21世紀初的今日又成熱門話題，意涵卻與冷戰時期截然不同。

² 例見 Nancy B.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p. 63-68.

³ 例如李建編著，《“反攻大陸”密謀透析》（北京：華文出版社，1996），即以全書的篇幅，描述國府在1950-1960年代，打算藉著韓戰與大陸發生天災及文革的人禍，發動反攻大陸的計謀。此書雖然宣稱使用了許多史料，但完全沒有附註。

⁴ 檢閱中文報刊文章索引的篇目，可以發現國府有關返回大陸的口號，1950年代以「反攻大陸」為主，1960年代逐漸代之以「光復大陸」，到了1970年代「反攻大陸」逐漸減少至絕跡，同時慢慢以「反共復國」與「光復大陸」並用，至1980年代末，這些口號全部走入歷史。

⁵ Steve Tsang, “Chiang Kai-shek and the Kuomintang's Policy to Reconquer the Chinese Mainland, 1949-1958,” in Tsang, ed.,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政策為討論的重心，但於 1993 年發表時，國府相關檔案開放還相當有限，文內所引用的資料，除美、英等國外檔案外，主要是蔣介石與蔣經國業已出版的言論著述，故以國府未發動反攻行動，而宣稱蔣並不是真的打算反攻，也強調蔣的軍政措施，都是在「把臺灣建立成一個中國的模範省」。這樣的結論，說服力當然有限。⁶該文使用國府方面檔案的不足，使得此一題目的研究，還有許多發展的空間。

可惜到目前為止，國府有關反攻準備與策略的總統府與軍方資料，筆者得見者不多，還是很難建構「反攻大陸」政策計畫與執行過程的完整面貌。倒是美國相關資料，除中央情報局檔案外，幾已全部開放，對美國決策者有關這個主題的想法，可以有較完整的描述與分析。筆者研究美國對臺政策十餘年，一直對美國與國府「反攻大陸」政策之轉折與執行間的關係很感興趣，以往發表的論文中，也多少提到這個問題。⁷本文考察的焦點，是華府在 1950 年代兩次臺海危機期間對「反攻大陸」看法的轉變，引申及其對國府「反攻」政策的影響。所利用的資料，仍以美國官方文件為主，而輔以近年來所能看到的蔣中正總統檔案與外交部、國防部檔案。至於國府的想法與做法，限於資料與篇幅，暫不詳論。

Taiwan since 1949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p. 48-72. 本文去掉附註的中文版本，見曾銳生，〈一九五〇年代蔣中正先生反攻大陸政策〉，《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19（民國 84 年 12 月），頁 19-26。

⁶ 曾銳生在國史館演講此一題目時，結論即受到多位參與者的質疑。見該文在《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19 內，頁 26-32 之「自由討論」一節。不過 1950 年代初期的臺灣省主席，後來與蔣介石反目而流亡美國的吳國楨，也認為蔣自始至終就沒有真正「反攻大陸」的打算，所以年年開出不兌現的支票，只是爲了要以戒嚴體制來壓制臺灣。見楊碧川，《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 72。另外，陶涵(Jay Taylor)也認為蔣介石並不是真的想反攻，見陶涵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2000），頁 235, 285。

⁷ 可見 Su-Ya Chang, "Unleashing Chiang Kai-shek? Eisenhower and the Policy of Indecision toward Taiwan, 195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0（民國 80 年 6 月），頁 379-381, 400；張淑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九五〇年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歐美研究》，卷 24 期 2（民國 83 年 6 月），頁 69-70, 88-93；張淑雅，〈藍欽大使與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對臺政策〉，《歐美研究》，卷 28 期 1（民國 87 年 3 月），頁 218-222 等部分的討論。

二、九三砲戰前美國對「反攻大陸」的政策

國府自從撤退至臺灣後，一直以「反攻大陸」為念茲在茲的政策目標。蔣介石在 1950 年 3 月 1 日復行視事時，即揭櫫「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此後近二十年的時間，準備反攻成為國府在臺施政與宣傳的重點。⁸當時美國的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對國府在臺前景原不看好，但其因 1949 年 8 月出版《中美關係白皮書》受到嚴厲批判，故在國府遷臺之際，不願多作「落井下石」的動作，只是消極地「袖手旁觀」，等待國共內戰的「塵埃落定」，以便與中共展開正常的關係。韓戰爆發、尤其是中共介入後，美國雖宣佈將臺灣海峽「中立化」，但不願臺灣在韓戰期間落入中共手中，以免增長共黨集團的威風，不得已逐漸增加對臺灣的軍經援助，連帶與國府關係也漸趨密切。就美國決策者而言，這只是在韓戰與冷戰的大局勢下，國共內戰的「塵埃」難以落定，而不得不然的措施。美國對蔣介石與國府的嫌惡與不信任依舊，連正式承諾保衛臺灣都不願意，何況是幫助他們「反攻大陸」？不僅如此，華府決策者還深怕國府主動挑釁，將美國捲入與中共的大規模衝突，故除在軍援計畫與交付上斤斤計較，打算讓國府只有「防禦」而無「攻擊」能力之外，⁹還時常公開批駁國府有關「反攻在即」的喊話。直到韓戰停戰談判陷入膠著，為了向中共施壓，也為了維持國府的士氣，杜魯門政府才不再公開批評國府的反攻國策。¹⁰

儘管杜魯門政府對國府大潑冷水，但在冷戰的大環境下，美國決策者並未完全排除「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也未忽視這個「口號」在與共黨鬥爭中所能發揮的作用。情緒上，他們著實厭惡共黨，故希望中共政權從大陸上消

⁸ 雖然曾銳生認為蔣並未真正準備反攻，國府軍方資料顯示反攻計畫為國防部施政非常大的一部分，這些計畫原件雖不得見，但國防部史政局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四部《復興基地整軍備戰》（三）（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76 年），頁 1779-1810 中可以找到這些計畫的大要。

⁹ 對軍援與國府軍事行動的限制，見張淑雅，〈韓戰期間美國對臺軍援政策初探〉，《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國際關係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0 年 12 月）一文之討論。

¹⁰ Su-Ya Chang, "Unleashing Chiang Kai-shek?", 頁 379。

失；實際層面上，則中共介入韓戰之後，國軍信誓旦旦的反攻口號與不時對大陸沿海的騷擾行動，對中共多少有牽制的作用，減輕了戰場上聯軍的負擔。不過在理智上，華府決策者很清楚要剷除中共政權越來越困難，美國既不願投注太多的精力與資源來導致或加速中共的覆滅，也不認為國府能獨力推翻中共政權。換句話說，華府決策者們覺得為了整體冷戰需要，必須善加利用國府「反攻大陸」的口號，但擔心國府一旦展開反攻行動，會將美國拖下水，又不得不屢屢告誡國府不要輕舉妄動。¹¹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觀點來看，這樣的想法、做法可以並行不悖，但反映在政策聲明與執行上，卻造成美國可能支持國府反攻的印象。這種夾雜冷戰邏輯與現實考量所產生的矛盾，到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上任、解除臺海中立化之後，更加明顯。

艾森豪競選時，宣稱當選後將及早結束韓戰，上任後又馬上宣佈解除臺海中立化，甚至暗示不惜使用核武以求韓戰早日停戰，加上他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激烈的冷戰言論，與不時公開宣稱要「解放」或「捲回」鐵幕，¹²在在顯示艾森豪政府反共立場較其前任堅定，也可能運用一切手段打擊共黨，包括支持國府反攻大陸在內。¹³不過私底下，艾森豪政府小心謹慎地避免與中共發生正面衝突，實際的程度比其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故在解除中立化之前，華府已先取得蔣介石在採取重大軍事行動之前先與美國諮商的承諾，還計畫透過中美軍方的聯合參謀作業，預防國府輕舉妄動。¹⁴雖然艾森豪知道由於當時美國國內濃厚的反共氣氛，他的政府「承擔不起」

¹¹ 見張淑雅，〈藍欽大使與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對臺政策〉，《歐美研究》，卷 28 期 1，頁 215，及 Su-Ya Chang, “Unleashing Chiang Kai-shek?”，頁 379 之討論。

¹² 但如同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鮑威(Robert R. Bowie)所言，杜勒斯的說詞只反映出他無法接受蘇聯獨霸東歐的事實，他並未籌畫讓蘇聯放鬆對其傀儡政權控制的辦法，也從未打算以武力來「解放」鐵幕國家，所以難怪有人批評他的「解放」論調不是出自真心。見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of Robert R. Bowie, 1964, pp. 47-48, John Foster Dulles Oral History Project,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ML).

¹³ 見 Norman A. Graebner, “Eisenhower and Communism: the Public Record of the 1950s,” in Richard A. Melanson and David Mayers, eds., *Reevaluating Eisenhow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50s*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 70.

¹⁴ 見 Su-Ya Chang, “Unleashing Chiang Kai-shek?”，頁 376-377 之討論。

指稱蔣介石政權只侷限在臺灣一隅的「後果」，只能繼續承認國府是「代表全中國」的政府，¹⁵但是連「看起來」反共意識最強的杜勒斯在上任之前，都覺得讓國府攻擊大陸是「不可能的」，其他高層官員更不願意協助國府反攻。在 1953 年 11 月間，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終於正式決議：對華政策必須避免有任何協助國府返回大陸的「意涵」。¹⁶

雖然有此決議，但爲了維護國府的士氣，讓臺灣發揮在冷戰中的戰略作用，華府決策者既未公開宣稱，也未明白告訴國府：美國不可能支持其反攻大陸；¹⁷華府甚至還「鼓勵和支持」國府對大陸打游擊，藉以對中共施壓，同時牽制中共在其他地區的行動。¹⁸杜勒斯更時常私下對國府官員說「不能視中國大陸現在政權爲一永久事實，將來必設法使有變更」；¹⁹甚至當國府敦促美方與之訂定正式的共同防禦條約時，他還以不願限制國府的反攻行動加以推拒。²⁰華府這種曖昧的態度，加上國府從自身立場與冷戰邏輯上所引伸出來的期望，多少助長了國府想依靠美國「反攻大陸」的夢想。至少在韓戰期間，蔣介石還認爲可以與美方協商反攻大陸的方案，並要求美國增撥反攻初期所需的武器。²¹在艾森豪上任前，國府更是滿懷希望地想說服美國新政府積極支持反攻，以整體解決亞洲共黨擴張的問題。²²

¹⁵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MD) at the 169th NSC Meeting, November 3, 195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以下簡寫爲 *FR1952-54*) , 14(1):274.

¹⁶ Su-Ya Chang, "Unleashing Chiang Kai-shek?", 頁 380。

¹⁷ Thomas E.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Together with an Implication for Outer Mongolia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p. 55-56.

¹⁸ 張淑雅，〈臺海危機前美國對外島的政策，1953-195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 (下) (民國 83 年 6 月)，頁 298-299。

¹⁹ 例見顧大使杜勒斯第十九次談話，民國 41 年 1 月 14 日，600.14 中日和約 (會議紀錄談話紀錄及說帖)，外交部。

²⁰ 第 916 號電，顧維鈞致葉公超，1954 年 5 月 19 日，f: B.212(I), box 152, Koo Papers,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BL).

²¹ 蔣之手令，民國 41 年，特交檔案軍事類，卷 6 膠套 2，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

²² Note of Conversation (NC), Koo, Yeh, and Dulles, November 19, 1952, 703.1 葉部長與藍欽、杜勒斯等談話紀錄，外交部。

當然，艾森豪政府實際的態度，很快地澆熄了國府的熱望，²³因此蔣介石在韓戰停戰時，頓時覺得應該「澈底放棄以美援反攻復國之幻想」。²⁴在抒發了一時的挫折感後，由於華府高層仍未明言不支持反攻，國府還是繼續爭取更多的軍援，以加強國軍戰力，準備反攻。誠如藍欽大使所指出的：「有些國府官員相信，縱然美國不能事先承諾支持反攻大陸，但一旦戰爭開始，美國迫於情勢可能不得不幫助國府。」²⁵換句話說，艾森豪政府基本上延續了其前任對「反攻」的曖昧態度。就華府立場而言，當中共口口聲聲的「解放臺灣」與國府信誓旦旦的「反攻大陸」口號均未付諸實際行動時，華府決策者對「反攻」可以有充分的模糊空間；一旦海峽砲火響起，美國就不得不面對國府「反攻」國策的問題。

三、第一次臺海危機與「反攻大陸」

1954年9月3日中共大規模炮擊金門，開啓了第一次臺海危機。在此之前，「反攻大陸」的口號雖然充滿挑釁意味，但一來國府公開承認反攻力有所未逮，²⁶二來美國也自信有本錢控制國府不得輕舉妄動，加上國共雙方雖在大陸沿海島嶼衝突不斷，卻未發生大規模的衝突。既然這個口號並沒有導致迫使華府與中共開戰的危機，華府決策者也就任由其意願與實際做法間的矛盾與曖昧持續存在，以便對中共施壓，並保持其行動的「彈性」。但九三砲戰爆發、國共武裝衝突擴大後，美國被迫正視其對「反攻大陸」立場的內在矛盾，並重新思索國府在與共黨集團鬥爭中所可以扮演的角色。此次臺海危機延續到次年4月23日周恩來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中，宣稱願與美國談判舒緩遠東緊張局勢才算結束。危機期間，

²³ 見 Su-Ya Chang, "Unleashing Chiang Kai-shek?" 一文的分析。

²⁴ 蔣介石自記，民國42年6月30日，引自劉維開，〈蔣中正總統對韓戰及相關問題的看
法與政策〉，《近代中國》，期137（民國89年6月），頁110。

²⁵ Letter, Rankin to Robertson, May 11, 1955, 793.5/5-1155, RG 59, NA.

²⁶ 例如1953年2月12日，蔣介石向合衆社記者承認國府當時無力全面反攻大陸。見《中
央日報》，民國42年2月14日頭版頭條。

美國與國府談判共同防禦條約（以下簡稱防約），以及要求國府放棄金門、馬祖（以下簡稱金馬）等外島的過程，都促使美國較深入思考有關「反攻大陸」的問題。以下分兩部分討論此次危機中，美國對「反攻大陸」想法的轉變。

（一）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限制反攻

九三砲戰爆發後，美國之所以必須面對「反攻大陸」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金馬等外島與國府「反攻大陸」國策間的密切關連性，亦即國府總宣稱的「金馬是反攻大陸的跳板」，故要應付外島問題，不得不考慮其對「反攻大陸」的做法與立場。此點在 1955 年初危機升高之後尤為重要，將留在下一小節中討論。

另一方面，由於這是國府遷臺以來國共雙方最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外界對此砲戰是否開啓「反攻的契機」多所揣測。國府官員在新聞界追問下，也多有將外島問題與反攻混為一談的。例如行政院長俞鴻鈞在砲戰爆發後不久的施政報告中，即強調國府準備轉防守為反攻。²⁷但他向合眾社記者強調：光復大陸只需美國後勤援助，無意使美捲入戰爭漩渦。²⁸駐美大使顧維鈞在與 Telenews 記者談話時表示：國府反攻準備已經完成，歡迎中共隨時攻打臺灣，因為這是國府等待的機會。²⁹幾天後他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本週人物(CBS “Man of the Week”)」節目專訪時，又說：當時機成熟、環境有利，且盟友——尤其是美國——願意幫忙時，國府即會反攻；但他也強調除非有成功的把握，國府不會輕易開始反攻行動。³⁰外交部長葉公超亦在美國公開宣稱大陸為我國合法領土，故可隨時反攻，美方並未勸國府停止對大陸

²⁷ 顧維鈞於當年 9 月 14 日告訴宋子文，見“Reminiscence of V. K. Wellington Koo,” Transcript of Oral History, Butler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以下簡稱 *Koo Memoirs*），vol. 7, p. 132（以下簡寫為 7:132）；《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9 月 15 日。

²⁸ 《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9 月 24 日。

²⁹ Transcript of Ambassador Koo's Interview with Telenews, September 7, 1954, Appendix II, *Koo Memoirs*, 7:I:iv-vii.

³⁰ September 19, 1954, *Koo Memoirs*, 7:138.

的攻擊行動。³¹

國府官員這些說法可能只是照實回答記者的詢問，但因新聞界對砲擊後的國府動態本來就很關心，故大加渲染。例如《中央日報》以明顯標題，報導顧維鈞在 CBS 節目中宣稱「時機成熟我即反攻，一旦反攻便能勝利」。³²而國府軍事發言人張彝鼎說「匪將繼續向我炮擊，直至匪選擇時間向我進攻」，但美國報紙則報導說：國府軍事發言人宣稱國府將繼續在金門砲戰至戰事擴大(until something bigger happens)。³³國府官員對於反攻的說詞，經過新聞界的炒作，讓原本就擔心國府藉機擴大衝突的華府決策者更加緊張，故在謀求解決危機策略時，連帶正視了「反攻大陸」的問題。

砲戰一開始，爲了避免國府趁機反攻，華府極力約束國府的反擊，也修改了以往的政策，不再支持國府游擊行動。³⁴接著在杜勒斯主導下，華府決定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來應付危機，即一方面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停火案，防止中共佔領金馬，同時與國府簽訂共同防約，嚇阻中共攻擊臺灣、澎湖（以下簡稱臺澎）。³⁵這是自國府遷臺以來，美國首次明確決定要在臺海地區「維持現狀」。

就停火案而言，儘管美國向國府強調其目的在保住外島，但國府卻認爲接受安理會安排停火無異於承認現狀、接受「兩個中國」。³⁶蔣廷黻向遠東助理國務卿勞勃森(Walter S. Robertson)指出，該案將斬斷國府反攻的希望，而「反攻」的「夢想」有「超越軍隊與艦隊的力量」，一旦失去這個期望，

³¹ 《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10 月 19 日頭版頭條。

³² 《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9 月 21 日。

³³ 第 33 號電，葉部長致外交部，民國 43 年 10 月 6 日；俞大維致沈昌煥，民國 43 年 10 月 6 日；第 467 號電，外交部致葉部長，民國 43 年 10 月 6 日；全收入 729.81 臺灣地位（二），外交部。

³⁴ 見張淑雅，〈臺海危機前美國對外島的政策(1953-1954)〉一文第五節之討論。

³⁵ 杜勒斯這個策略設計的理论基礎與實際執行，見張淑雅，〈安理會停火案：美國應付第一次臺海危機策略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2（下）（民國 82 年 6 月），頁 61-106；及張淑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等兩篇文章的討論。

³⁶ 見張淑雅，〈安理會停火案〉，頁 75-77 之討論。

國府將無以為繼。³⁷其實這點美方完全明白，³⁸但還是繼續向國府強調儘管立即反攻希望渺茫，美國並未要求國府放棄反攻，只是要國府對停火案暫時採取保留的態度，先保住外島，以便在「國際情勢發展有利」之時，可以從外島反攻。³⁹無論美方說詞如何漂亮，國府還是竭力反對停火案。此案拖延數月後，終於在 1955 年 1 月底，即一江山陷落後、大陳撤退前，由紐西蘭具名向安理會提出，然因中共拒絕出席討論該案，杜勒斯雖極力推動，終於還是不了了之，對「反攻大陸」政策較無直接的影響。

另一方面，與美國訂定共同防禦條約（以下簡稱防約），則是國府多年來努力的目標，只是訂約難免影響國府「反攻」行動的彈性，因此國府在極力爭取之餘，也要設法避免防約對其反攻行動的限制。艾森豪政府遲遲不肯與國府訂定防禦條約，主要的說詞是不願意妨礙國府反攻的彈性，也不願因防約而被捲入與中共的大戰中；此外，美國還認為若防約簽訂後國府展開反攻卻不成功，反會讓臺灣陷於險境。⁴⁰

九三砲戰爆發後幾天，蔣介石趁杜勒斯訪臺的機會，全力爭取與美國簽訂防約。針對美國不願訂約的顧慮，他指出除軍經援助外，國府甚至會要求美國不要直接參與反攻作戰，以免坐實了中共有關「美國侵略」的指控，甚至引起大陸人民的反感。此外，蔣強調國府「除非有勝利的把握，不會輕言反攻。（亦即）反攻一旦開始即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沒有任何愛國的政府會在這一點採取躁進的舉動……何況，美國很清楚我們政府是否有可以反攻的條件，因為很顯然沒有足夠的美國武器、經濟與技術上的援助，我們的反攻沒有成功的機會……換句話說，除非美國同意，我們不能採取反攻行動。」

³⁷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MC), Robertson with Yeh, Koo, and Tsiang, October 20, 1954, *FR1952-54*, 14:781-2; October 21, 1954, *Koo Memoirs*, 7:1112.

³⁸ 例如艾森豪私下毫不諱言停火案會將外島中立化，降低國府擴大衝突的機會，等於斬斷國府反攻的希望，見 MD at the 216th NSC Meeting, October 6, 1954, *FR1952-54*, 14:693.

³⁹ MC, Robertson with Yeh, Koo, and Tsiang, October 20, 1954, *FR1952-54*, 14:781-2; October 21, 1954, *Koo Memoirs*, 7:1112.

⁴⁰ 國府爭取防約與美國的抗拒詳情，可見張淑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文第三節的討論。

但他補充說：「只要我們不反攻，亞洲的共產問題無法解決。」⁴¹蔣的坦誠與讓步，目的全在消除美國對簽訂防約的顧忌，可惜並沒有打動杜勒斯。杜勒斯只覺得蔣看來累了、老了，雖然嘴上說相信可以反攻，但聽起來沒有以前的自信。⁴²

至10月初，美方決定以防約「賄賂」國府不要杯葛停火案後，杜勒斯才開始重視國府「不經美國同意不採取反攻行動」的讓步，並企圖以此來掌控國府的軍事行動，以消弭危機、維持臺海現狀。在與杜勒斯討論防約時，葉公超重述蔣介石的立場，即保證國府會遵守諾言，沒有美國同意不對大陸大規模用兵。他並強調國府反攻的「夢想」雖然有些不切實際，但這是國府政權的基礎，不能自己宣佈放棄；⁴³雖然國府並不妄想當時即可反攻，但必須反對任何暗示將自由中國「永遠禁錮在臺灣」的條約、協定或決議。⁴⁴美方因此同意在防約外成立一種諒解，規定國府未得美國同意不大舉用兵。而蔣介石與葉公超的說法，不免讓杜勒斯覺得國府爲了正式與美國訂約，願意付出放棄反攻大陸夢想的代價，⁴⁵因此在防約談判過程中，順勢竭力爭取對國府軍事行動最大的控制權。⁴⁶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於1954年12月2日在華府簽字，當日即向新聞界公佈全文；規範使用武力的換文於12月10日簽字，內容則至一個多月後，國府立法院通過防約時，才正式對外公佈。在條約內容上，讓人與「反攻大陸」問題產生聯想的條文是第六條，指出條約「將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還有換文上所說「鑑於兩締約國在該條約下所負之義務，及任一

41 MC, Chiang with Dulles, September 9, 1954, 607.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外交部。

42 MD at the 214th NSC Meeting, September 12, 1954, *FR1952-54*, 14:613-615.

43 MC, Dulles with Yeh, Koo, et al, October 27, 1954, *FR1952-54*, 14:801; NC, Yeh, Koo with Dulles, in f: B.13.1 (e), box 145, Koo Papers, BL. 葉公超報告此談話的電報並未提及他對反攻大陸形容爲「夢想」，見酉感電，葉公超致蔣介石，民國43年10月28日，607.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外交部。

44 MC, Dulles with Yeh, Koo et al., November 2, 1954, *FR1952-54*, 14:846.

45 MD at the 220th NSC Meeting, October 28, 1954, *FR1952-54*, 14:807.

46 這個控制權的爭議，是防約談判最困難的部分，詳細經過見張淑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頁88-93的討論。

締約國自任一區域使用武力影響另一締約國，茲同意此項使用武力將為共同協議之事項，但顯屬行使固有自衛權力之緊急性行動不在此限。」⁴⁷後者被解釋為美國可以限制國府反攻的依據，前者則被引為防約不禁止反攻的證明。

由於在防約談判之前與談判期間，外界關於美國限制國府非得美國同意不得反攻的傳聞不斷，⁴⁸因此國府除爭取簽訂防約之外，必須澄清國內外對防約與「反攻大陸」關係的疑慮。在消除內部的疑慮時，國府強調以換文方式達成對使用武力的諒解，與現行的做法並無不同，因為國府在外島的戰事，事先均與美方協商，將來大規模的攻勢行動，也必須得到美方的同意與支持，否則困難太大。「所以這一項規定，並不增加我國的承擔，也並沒有超過我國因事實上的需要而所受的約束。」⁴⁹對外宣傳方面，葉公超在防約簽訂當天，聲明該約不但不會妨礙反攻大陸，而且根據第六條，條約適用範圍還可以包括收復的大陸領土。但葉刻意不諱言防約規定國府對大陸採取非防禦性的攻擊行動前，應該先與美國商議。⁵⁰另外，國府也強調防約的簽訂，

⁴⁷ 條約與換文全文可見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中華日報社，民國 70 年增訂再版），頁 90, 98。

⁴⁸ 例如砲戰爆發後，美國報紙報導民主黨人相信國府與美方有祕密協定，規定國軍不得攻擊大陸。國府覺得難以回答記者的詢問，故請藍欽請示國務院。國務院指示可以說共同防禦協助計畫要求參與國承諾促進國際間諒解及善意，並維持世界和平，故相信國府會遵守聯合國憲章及此項承諾；但此不意味限制國府行動，雙方亦無祕密協定限制國軍行動，國府的自制乃出於獨立國家的自發行動。沈昌煥藍欽談話紀錄，民國 43 年 9 月 20 日；Message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Embassy Taipei, September 29, 1954；鄭建生歐陽文達談話紀錄，民國 43 年 9 月 30 日；全收入 409 解除臺灣中立化後反攻大陸計畫，外交部：第 95 號電，外交部致顧大使，民國 43 年 11 月 12 日，談及香港《工商日報》論國府與美國關於約束反攻的祕密諒解，607.1 條約司，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外交部。

⁴⁹ 〈俞院長向中央常務委員說明稿〉，民國 43 年 11 月 28 日，607.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外交部。根據薛毓麒在此文件上的眉批，此件因當日中常會停開而未送出，只是存案備考。但以後沈昌煥在向行政院與立法院報告時，一直使用此基本說詞，例見〈沈代部長向立法院全院就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案提出之報告稿〉，民國 43 年 12 月 27 日，607.1 條約司，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三），外交部。

⁵⁰ 見《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12 月 3 日頭版頭條。

表示「美國反共的決心」，與「鞏固了中美兩國傳統的深厚友誼」，也將於美國在太平洋區域所建立的集體安全系統「更鑄一環」。防約還進一步鞏固反攻復國基地，「使我們反攻大陸希望的實現，有了進一步的保障」，反攻大陸的準備將因而加強，反攻的力量「當能獲得更實際的更有效的發展」。⁵¹換句話說，在國府解釋下，防約不但無礙「反攻大陸」，反而有所助益。

當時美國爲了維持國府的士氣，並未宣傳防約與換文對國府反攻的約束力，但其解釋與國府大不相同。在與艾森豪討論時，杜勒斯指出國府簽了防約換文，等於同意不在臺澎以外的地區使用接受美援裝備訓練的部隊；⁵²他也向英國大使表示「防約與換文讓蔣不可能在未取得美國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向大陸採取任何行動。」⁵³防約送到參院後，民主黨內部流傳一份說帖，指出防約的問題，其中提到防約未明文規定國府不得美國同意不反攻的諾言，缺乏避免與中共開戰的保障。參議員史巴克門(John Sparkman)乃向媒體指出：換文是國府不會將美國捲入戰爭的最好保障。⁵⁴在參議院外委會審議防約時，杜勒斯更明白地表示：國府反攻軍事行動須先得美方同意。⁵⁵因此，參議院在批准防約時，加上三條解釋，其中之一即指出參議院了解「締約任一方自中華民國控制下的領土上採取軍事行動，須獲雙方一致同意。」⁵⁶此後，美國政府即認定防約與換文對國府「反攻大陸」具有約束力。⁵⁷

⁵¹ 防約宣傳重點（黃少谷致沈昌煥便箋附件），民國 43 年 11 月 30 日，607.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外交部。有關防約的反應與宣傳情況，可見美國大使館的報導，Desp.280 from Taipei, re Reaction in Taipei to 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December 7, 1954, 793.5/12-754, RG 59, NA。

⁵² TC, Eisenhower (Ike) with Dulles, January 16, 1955, *FR1955-57*, 2:277.

⁵³ Tel.273, British Embassy in Washington to the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9, 1955, FC1041/185, FO371/115029,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Garden, UK (PRO).

⁵⁴ 第 441、444、445 號電，大使館致外交部，民國 44 年 1 月 13 日，607.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三），外交部。

⁵⁵ 第 524 號電，顧維鈞致外交部，民國 44 年 2 月 7 日，607.1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三），外交部。

⁵⁶ 參議院解釋全文，見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頁 99-100。

⁵⁷ 例如 1962 年 6 月 27 日，甘乃迪(John F. Kennedy)總統在記者會中強調防約換文的約束力，即國府未得美同意不得採取「反攻大陸」的行動。見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

儘管華府的決策者都認為透過防約與換文，可以嚴格控制國府「反攻」的行動，但他們只打算避免衝突擴大以維持臺海的現狀，並無意永遠禁止國府反攻，就此劃峽為界，「正式地」製造「兩個中國」。當然，杜勒斯毫不諱言蔣反攻大陸的機會「每天都在降低」，且如果臺灣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地投票，他們會選擇獨立。⁵⁸艾森豪也認為蔣若打算重掌大陸政權，只能靠大陸發生大規模起義並邀請他返回，或者設法擴大衝突，導致與中共全面的大戰；杜說沒有證據顯示這種起義會發生，而美國當然會全力阻止大戰的爆發。⁵⁹不過美國決策者一方面不甘在危機中示弱，一方面希望在冷戰策略設計上保留彈性，在時機恰當、美國又同意的情況下，讓國府主動攻擊中共。⁶⁰誠如符立德(General James A. Van Fleet)所建議的，當中共發動侵略（最可能是打臺灣或金馬）時，美國應該利用國府反擊。國府可以登陸海南，接著登陸遼東半島，建立灘頭基地。⁶¹因此，杜勒斯在向國家安全會議提出的檢討美國對華政策報告書中，即指出防約並不排除國府在有利時機，例如中共政權自行垮臺時，在美國的同意下把握機會反攻。⁶²

內部討論之外，杜勒斯私下也將這種想法向葉公超與顧維鈞表達的非常清楚。例如當葉公超對杜勒斯提到國府反攻的「夢想」有些不切實際時，杜勒斯卻說反攻並非不切實際，因為像中共那樣的專制政權很可能突然垮臺，他也不願見到「臺灣變成自由中國的監獄」，只是國府自己承認目前力有所不逮，故輕率行動可能會造成國府的覆滅，國府要耐心等待機會。⁶³過了幾天，杜勒斯再度向顧維鈞與葉公超強調中共政權總有一天會「衰弱、分裂或

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334。

58 MD at the 216th NSC Meeting, October 6, 1954, *FR1952-54*, 14:700.

59 MD at the 214th NSC Meeting, September 12, 1954, *FR1952-54*, 14:613-615; MD at the 216th NSC Meeting, October 6, 1954, *FR1952-54*, 14:693.

60 Memo, McConaughy to Robertson, October 27, 1954, re: Secretary's Briefing Meeting on NSC China Policy, 611.93/10-2754, RG 59, NA.

61 Memo, Robertson to Dulles, October 25, 1954, *FR1952-54*, 12:953-955.

62 Memo, Dulles to the NSC, October 28, 1954, *FR1952-54*, 14:811.

63 MC, Dulles with Yeh, Koo et al., October 27, 1954, *FR1952-54*, 14:801.

崩潰」，到時就是國府反攻的最好時機。他還說儘管美國盡量避免與中共或蘇聯開戰，不過若戰爭臨頭也會毫不猶豫地迎戰，那將也是國府反攻的好時機。⁶⁴簡言之，杜勒斯認為國府應遵循「機會主義」的原則，在適當的時機加速中共政權的崩潰，但不要過早行動。⁶⁵不過杜勒斯完全未考慮到這麼「萬全」的設想，要如何才能執行？在這種指導原則下的政策曖昧，又會衍生出什麼樣的問題？

華府這種「保持彈性」的打算，顯示其在九三砲戰的刺激下，雖然打算暫時維持臺海現狀，但冷戰思惟使其不打算放棄行動彈性，故雖透過防約換文加強了對國府軍事行動的控制，但對「反攻大陸」，則只告誡國府不該躁進。直到 1955 年 1 月間，臺海危機再度升高，3 月間甚至引起全球恐戰風潮，迫使其在思索應付策略之餘，對「反攻大陸」與國府自我定位問題，做了較深入的思考，才將輪廓模糊的「機會主義」觀念，整理出較清楚的「待機反攻」架構。

（二）放棄金馬與待機反攻

1955 年 1 月 10 日，中共空軍大舉出動，密集轟炸大陳；一週後，中共海軍登陸附近的一江山島，幾天內攻佔全島；2 月初，國府在美國壓力下，從大陳島撤退，不久後又放棄南麂島。這些嶄新的戰況，將暫時沉寂的外島緊張情勢推向高潮，也讓華府決策者的危機意識再度升高，而因應的過程則讓美國夾在盟邦（國府、英國等）及敵人（中共）間左支右絀、傷透腦筋。⁶⁶美方曾打算以公開宣示協防金馬，換取國府自大陳撤退。因此艾森豪要求國會授權以武力防守臺澎及其相關地區，美國國會遂於 1 月 28 日通過此項授

⁶⁴ NC, Yeh, Koo with Dulles, November 2, 1954, *Koo Memoris*, 7:1133.

⁶⁵ MC, Dulles with Yeh, Koo et al., November 2, 1954, *FR1952-54*, 14:846.

⁶⁶ 美國固然因為中共連串的敵對行動而憤怒，對國府的不合作與英國不斷的施壓，也常深感挫折。華府尚有迫使國府採就範的籌碼，對英國則較無計可施。例如艾森豪覺得可以反問英國：若受到威脅的是香港，英國會希望美國怎麼作？杜勒斯也抱怨英國一點都無法理解美國已經從國府取得了許多的讓步。見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C), Ike and Dulles, February 16, 1955, *FR1955-57*, 2:277. 最終說來，英國的想法常迫使美國修改策略。

權的「臺灣決議案」。同日，紐西蘭致函聯合國安理會，請討論臺海狀況，安理會於三日後表決將此案納入議程，並邀請中共參與此案的辯論，中共隨即拒絕。在此期間，美國改變主意，只願意私下承諾協防金馬，故與國府發生激辯，差點讓大陳撤退計畫無法執行。⁶⁷凡此種種，讓華府決策者對外島問題感到既焦躁，又無奈。

美國最重要的盟邦英國認為：解決危機最「實際」的做法，是讓國府放棄所有的外島，與中共劃峽而治。倫敦當局覺得只要解除國府攻擊大陸的威脅，並讓中共取得外島，即可以滿足中共，帶來臺海地區的和平。其實從九三砲戰爆發，英國就不斷地要求華府走這條路，只是華府決策者不打算馬上讓中共得到這麼大的甜頭，免得看起來像在「侵略者」面前示弱。美國雖然早在砲戰爆發後就認定外島沒有足夠的戰略價值，卻認為這些小島有支持國府士氣的「心理」價值，一旦失去，可能導致國府士氣崩潰，連臺澎都無法防守。而美國的基本策略是提供軍備，讓自由國家以自己的兵力抵禦共黨勢力的擴張，放棄外島會影響這個整體戰略。⁶⁸

從華府立場來看，放棄大陳已經是自由世界很大的讓步，中共該適可而止。不幸中共看來毫不領情，大陳撤退後對外島威脅依舊，華府因此一直未能掙脫「極端進退兩難的困境」。⁶⁹艾森豪因此頭痛萬分，恨不得那些「該死的小島沉到海裡！」⁷⁰加上英國屢次表示雖然願意支持美國協防臺澎，但

⁶⁷ 見張淑雅，〈安理會停火案〉與張淑雅，〈金馬撤軍？美國應付第一次臺海危機策略之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上）（民國 84 年 6 月），兩文中的相關討論。

⁶⁸ MD at the 232nd NSC Meeting, January 20, 1955, *FR1955-57*, 2:79-80.

⁶⁹ 外島危機初起時，杜勒斯說這個問題陷美國於「極端進退兩難的困境(a horrible dilemma)」；2月17日 NSC 開會時，艾森豪又說外島問題製造了「極端進退兩難的困境(a terrible dilemma)」。美國基本上對協防外島與否一直未作決定，因此一直在困境中掙扎。見 MD at the 214th NSC Meeting, September 12, 1954, *FR1952-54*, 14(1):619; MD at the 237th NSC Meeting, February 17, 1955, *FR1955-57*, 2:283.

⁷⁰ Legislative Leader Meeting with Ike, February 16, 1955, printed in Robert H. Ferrell, ed., *The Diary of James C. Hagerty: Eisenhower in Mid-course, 1954-195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95. 杜勒斯說大家都同意「如果那些小島沉到海底就太好了！」見 MD at the 237th NSC Meeting, February 17, 1955, *FR1955-57*, 2:281.

反對保護外島，讓國府可以放心的以這些小島當作「反攻的跳板」，故強烈建議華府應公開宣稱不打算協防外島，同時勸國府以放棄外島換取國際擔保臺澎安全，一勞永逸解決外島問題。⁷¹在此情勢下，艾森豪與杜勒斯不免逐漸覺得，讓國府撤出所有外島，不失為解決問題的辦法。當時美國認定國府之所以堅守金馬，是打算以外島作為攻擊大陸的基地，而艾森豪卻認為外島實在毫無作為「反攻跳板」的價值。⁷²因此在二、三月間，艾森豪與杜勒斯開始思考如何誘導國府逐漸減少外島駐軍或完全撤離外島時，連帶考慮到國府一再宣示的「反攻大陸」問題。

如前所言，多數美國決策者固然覺得國府沒有機會實現反攻的目標，⁷³但仍鼓勵國府不必放棄反攻。危機升高後，他們對「反攻大陸」口號所能發揮的牽制效益，評價明顯逐漸降低。在討論如何因應一江山陷落的國家安全會議中，國防部長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即明白指出「很明顯的，國民黨毫無征服及取代大陸中共政權的希望。」⁷⁴幾天後，杜勒斯也向英國大使麥金斯(Roger Makins)表示：美國已經不認為蔣有返回大陸的希望，他個人也認為除非很快反攻，一般流亡政府「不可能重掌政權」；而經過一段時間後，就算新政權發生危機，反對者也會在國境內找尋領袖，不會轉向流亡政府。⁷⁵這是杜勒斯首度這麼清楚地向英國表達他對國府命運悲觀的看法，也

⁷¹ 英國希望在臺海劃定停火線，將外島歸給中共，美國則只協防臺灣以維持臺海現狀的立場，從九三砲戰爆發後，就不斷向美國表示。英國首相邱吉爾更多次親自寫信給艾森豪作此表示。艾森豪與邱吉爾的通信，可見 Peter G. Boyle, ed., *The Churchill-Eisenhower Correspondence, 1953-195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一書第五章內所收的信函。

⁷² Letter, Ike to Douglas, March 9, 1955, f: Dulles March 1955 (1), box 4, Dulles-Herter Series (DHS), Whitman Files (WF), Eisenhower Library (DDEL). 連認為外島為「自由的前線」故積極支持國府防守的藍欽也認為外島沒有作為「反攻跳板」的價值。見 Letter, Rankin to William E. Massey, Jr., March 10, 1955, f:1, box 7, series III, Rankin Papers, ML.

⁷³ MD at the 220th NSC Meeting, October 28, 1954, *FR1952-54*, 14:807.

⁷⁴ MD at the 232nd NSC Meeting, January 20, 1955, *FR1955-57*, 2:77.

⁷⁵ Tel.273, British Embassy to the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9, 1955, FO371/115029, FC1041/185, PRO. 孟金斯在此電報中仔細報告了雙方談話內容與杜勒斯的想法（兩人一起晚餐，這封電報發報時間為晚上 8 點 27 分），但杜勒斯在自己起草的簡短談話紀

是最接近英國「兩個中國」政策的說法，因此英外相艾登(Sir Anthony Eden)非常重視，認為這種想法非常「實際而令人安心(realistic and reassuring)」。
艾登因此要麥金斯打鐵趁熱，極力要求美方公開聲明打算永久將蔣「禁錮」在臺澎，並不准他利用臺澎作為進攻大陸的基地。⁷⁶

美國並未採納英國的建議，而是採用較「柔性」的做法，希望國府在「機會主義」的基礎上，重新定義其「反攻大陸」的政策，終極目標則希望國府自動放棄外島。艾森豪認為「反攻」戰略不該以外島為基地，而是要直接登陸大陸；中共遲早會攻擊朝鮮半島或中南半島，蔣所該作的是將部隊準備好，到時才可直搗黃龍，「這是他唯一返回大陸的辦法」。⁷⁷換句話說，他希望能誘導國府自行從外島撤退，並將自己準備成「一股待機而動的力量(a force of opportunity)」，當中共在他處的行動造成該地區全面衝突時，即可馬上出擊。⁷⁸杜勒斯也有類似的想法，並於2月10日葉公超向其辭別時，向葉與顧維鈞詳細鋪陳。⁷⁹

杜勒斯勸國府以更實際與長遠的眼光，來重新思考自由中國在當前所應扮演的角色：屢屢宣稱來年即將反攻只會讓臺灣的人民一再失望，不但斲傷士氣，也有損國府的信用。美國不希望將自由中國永遠鎖禁在臺灣，但只要中共擁有十倍於國軍的忠實軍力，國府在沒有外力協助下反攻無異於自殺，所以年年空談反攻等於愚弄人民；不要設定反攻日程表，要耐心等待中共政權垮臺，準備接手。他認為中共內部分裂、大規模起義，或者世界性的大規模衝突，都可能造成中共內部的危機，國府應準備好趁機而動。杜讚揚蔣一向很有睿智，不妨開始引導人民以較長遠而實際的眼光來看反攻這件事。他

錄中，完全未提到他自己所說有關國府反攻與流亡政府的理論。見 MC, Dulles with Makins, January 28, 1955, *FR1955-57*, 2:161.

⁷⁶ Tel.497, Eden to Makins, February 1, 1955, FO371/115029, FC1041/185, PRO.

⁷⁷ Hagerty Diary, February 24, 1955, in Ferrell, ed., *The Diary of James C. Hagerty*, pp. 201-203.

⁷⁸ Tedul 6, Ike to Dulles (at Bangkok), February 21, 1955, *FR1955-57*, 2:301.

⁷⁹ 外交部長葉公超從1954年9月間率團到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後，即停留在美國，主持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簽訂，接著又協商大陳撤退，至1955年2月中才返回臺北。

說整個共產集團已經過度擴張，故危機難免，而「自由中國」準備好「隨時可以趁機介入」非常重要。「這種情勢或許今年就會發生……或許得等上好幾年。重要的是自己作好充分的準備，然後耐心等待適當時機來臨。」杜勒斯建議國府不妨師法西德總理艾德諾(Knorr Adenauer)的做法，默默準備統一而不預設日程，也不要堅稱將以武力達成統一。他指出當時確實有兩個政府在爭奪中國政權；正如美國接受分裂政權如南北韓、東西德、南北越的存在一樣，美國會幫助反共的一邊，但絕不會以軍事力量強制讓這些國家統一。杜勒斯認為自己已經把美國的立場說得入情入理，但在顧維鈞的詰問之下，他還是聲明他深信共黨邪惡政權必將崩潰，也應該繼續對中共施壓以導致其垮臺。⁸⁰杜勒斯沒有理解到他說詞中的矛盾，也未說明該如何拿捏「施壓」的分寸才會恰到好處。事實上國府宣稱「反攻」在即，對中共造成相當的壓力，若要繼續對中共施壓以造成其崩潰，為何要求國府放棄「反攻」口號呢？

除了向葉公超、顧維鈞諄諄告誡外，艾森豪從2月間即想派蔣介石信得過的特使，到臺北去兜售這種想法，⁸¹最後決定由杜勒斯親自向蔣灌輸「待機反攻」的理論。杜勒斯於3月初參加東南亞公約會議後，順道到臺北停留數小時，交換防約批准書，並與蔣介石會談。他勸蔣不要執意以軍事力量反攻，因為共黨政權必難久存，國府應等待其內部自行瓦解，或主動侵略臺澎、中南、朝鮮半島等地，導致自由世界齊力討伐的時機，設法取而代之；由於國府缺乏足夠的軍力，所以最好不要過事宣傳即將反攻，以免讓人民失望，或導致國際上不利的反響。蔣同意杜勒斯的論點，說他決不會「不與美國協調」（杜勒斯的報告則說「不經美國同意」）就攻擊大陸（杜勒斯的報告還

⁸⁰ MC, Dulles with Yeh and Koo, re: Farewell Call: the Prospect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February 10, 1955, *FR1955-57*, 2:252-257. 葉公超回答說國府有些官員有類似的想法，只是蔣在每年雙十節宣稱即將反攻，已變成一項傳統，因為蔣「就像一般老軍人一樣，喜歡唱點高調——他認為必須強調反攻在即以維持士氣。」他自己屢次暗中勸蔣不要公開預測反攻時機，不過蔣當時已經比較不堅持預設反攻時間表了。

⁸¹ 見張淑雅，〈金馬撤軍？〉，頁450。

加上蔣說：「實際上除此之外，國府也無計可施」），但強調爲了維持民心士氣，不容「反攻大陸之基本國策流於隱昧」，尤不能因「不言」而令大陸上同胞絕望。⁸²

表面上看起來，杜勒斯似乎說服蔣接受了「待機反攻」的論點，其實這本來就是國府的立場，蔣在杜勒斯九三砲戰後訪臺時，已經向他說明，只是杜勒斯沒有特別注意。⁸³蔣在此次會談中，強調的是宣傳反攻對維持士氣與人心支持的必要性，杜勒斯當時並未反駁。⁸⁴與杜勒斯一起訪臺的遠東助理國務卿勞勃森(Walter S. Robertson)在與蔣會談時，不但同意蔣所說與共黨談判會徒勞無功，還強調國府以後將在世界上擔負重責大任，也會是全球反共華人的領導中心和大陸人民期望的寄託，而中共終將被擊敗。⁸⁵這種說詞，加上前此杜勒斯對顧、葉所強調的仍須持續向中共施壓，顯示美國對「反攻大陸」的立場，並未因「待機反攻」構想的發展而明朗化，而杜勒斯的說服之旅，只怕也很難讓國府改變其反攻政策的想法或做法。

杜勒斯參加東南亞公約會議與訪問臺灣回美後，強調亞洲國家「對中共力量的懼怕」⁸⁶、中共難以遏制的野心，與自由世界退縮所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艾森豪也同意中共當時「無法無天，態度倨傲，自視過高，且不在乎

⁸² MC by Samson Shen, between Chiang and Dulles et al., at Chiang's residence, March 3, 1955, f: L.11, box 168, Koo Papers, BL; 第 311 號電，葉部長致顧大使，1955 年 3 月 9 日，f: B.13.1(e), box 145, *ibid.*; Dulte 29, Dulles to Hoover, March 3, 1955; MC, Dulles with Ike, March 6, 1955, *FR1955-57*, 2:323, 336-7.

⁸³ 見上一節之討論。

⁸⁴ 雙方對此次談話所作的紀錄重點不同。杜勒斯強調蔣同意他的論點，國府的紀錄卻指出蔣強調不能不宣傳反攻。不過杜勒斯在向英國與澳洲說明此談話內容時，倒有指出蔣說他儘管同意杜勒斯對國府新角色的論點，但爲了保持反攻的期望以激勵士氣，在公開宣示上還是必須斟酌辦理。見 Memo, McCounaughy to MacArthur, re: Summary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ecretary at Taipei, for transmittal to British Embassy, March 11, 1955, f: 320.13 US-ChiNat Relations 1955, CA Records, box 52, RG 59, NA; MC, Dulles with Australian Priminister Menzies, *FR1955-57*, 2:369.

⁸⁵ MC, Chiang Kai-shek with Robertson, March 3, 1955, f: L.11, box 168. KP, BL.

⁸⁶ MC, Dulles with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enzies, March 14, 1955, *FR1955-57*, 2:369.

草菅人命」，美國只能「下定決心，面對這個（外島）問題。」⁸⁷故當時華府決策階層有個共識，即短期內可能需要使用核武「教訓」一下中共，才可能讓臺海局勢平靜下來。⁸⁸此外，杜勒斯似乎相信如果強迫國府公開放棄反攻，某些國府領導人（譬如蔣經國）爲了達到回大陸的目標，可能會率衆向中共投誠；唯有維持「反攻」的期望，才能維持臺灣的士氣與蔣介石的威望，也才能保住臺灣。⁸⁹艾森豪也再度強調「反攻」是維持國軍士氣的要素，放棄外島等於將國軍永久禁錮在臺灣，也就是摧毀國軍生存的意志。⁹⁰

因此在3月間，雖然中共並未加強攻擊行動，華府高層自覺的危機感卻讓臺海局勢再度升溫，華府推動外島撤防或減防的腳步暫時遲緩下來，要求國府重新釐訂反攻立場的想法也跟著停頓。杜勒斯甚至在3月中的記者會上，答稱若中共對東南亞發動全面攻擊，美國將沒有理由禁止國府攻擊大陸。⁹¹他用詞相當謹慎，但加上華府高層爲了讓民衆有「使用核武心理準備」的公開談話與爭辯，不免引起全球恐戰風潮；恐戰所產生的國內外壓力，讓艾、杜兩人軟化其強硬的立場，再度決定應該朝放棄外島的方向走；而最好

⁸⁷ Minute of a Cabinet Meeting, March 11, 1955; MC, Ike with Dulles, March 11, 1955; MD at the 242nd NSC Meeting, March 24, 1955; Diary Entry by the President, March 26, 1955; all in *FR1955-57*, 2:353, 354, 390, 405. 艾森豪對中共的評價似乎深受杜勒斯的影響。杜勒斯的觀點見 *Diary of Hagerty*, March 11, 1955, box 1, *Diary, Hagerty Papers*, DDEL.

⁸⁸ Minute of a Cabinet Meeting, March 11, 1955; MC, Dulles with Wilson and Radford et al., r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March 26, 1955; both in *FR1955-57*, 2:353, 403.

⁸⁹ 杜勒斯在向內閣報告他與蔣談話的內容時，說蔣了解此時宣稱要反攻大陸聽起來有點「可笑 (foolish)」，但是他也知道很多人想要返回大陸，如果美國給他太大的壓力，那些人可能會以向中共投誠的方式回到大陸。見 *Hagerty Diary*, March 11, 1955, box 1, *Diary, Hagerty Papers*, DDEL. 美國本來就很擔心國府的士氣問題，所以蔣說這話對杜勒斯顯然很有影響，而中情局的評估也顯示蔣經國可能會領導這種反美的投誠；不過勞勃森與藍欽不相信這樣的判斷。見 MC, Dulles with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Menzies, March 14, 1955, *FR1955-57*, 2:369。

⁹⁰ *Randall Journal*, March 16, 1955, box 2, Washington 1955—vol. VIII, *Randal Papers*, DDEL.

⁹¹ 第 624 號電，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民國 44 年 3 月 15 日發，410.15 駐美大使館各項報告（一），外交部。美國國務院對外發佈新聞時，省略了這一點，見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March 28, 1955):526-527。

的路，仍是 2 月間所設想的：說服蔣自動撤出金馬，靜待最佳反攻時機。⁹²

當時讓艾森豪產生危機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杜勒斯所指稱國府士氣動搖、國軍將領可能被收買而倒戈，⁹³因艾森豪一向對國府部隊的「士氣」與「忠貞度」缺乏信心。⁹⁴他當時認定外島的價值，只在維持國府的士氣，以免國府因失去外島而守不住臺澎，讓東南亞因連鎖反應跟著不保。⁹⁵不過等到艾、杜傾向放棄外島時，就有空間容納對「反攻」與「士氣」的新解釋。政策規劃司(Policy Planning Staff)司長鮑威(Robert R. Bowie)首先想出一些論點，以破除艾、杜的顧忌。他指出若反攻的期望是維繫國府士氣的主要因素，就算成功守住外島，國府無法反攻，士氣還是會受損；至於那些因外島棄守而失望的人，終究會了解他們無法安全地倒戈，所以不必過慮；就算他們倒戈，也不會影響臺灣防禦。鮑威認為對美國保衛臺灣信心的高低，對國府士兵與中下級軍官的士氣可能更具影響力；至於臺灣人的士氣，也可能因為不會被捲入外島或外省人的「反攻」而提高。⁹⁶美國大使館的報告也指出，臺灣人主要關心的是臺灣安危，不是反攻大陸；外省人雖然因大陳撤退顯示反攻無期而感到沮喪，但也知道預期快速反攻不切實際，因此外島情勢的發展並未嚴重影響士氣。⁹⁷此外，駐華使館報告說外省人也很實際，他

⁹² 3 月間美國對中共與外島的態度轉強硬，卻反而引起全球的恐戰風潮，見張淑雅，〈金馬撤軍？〉一文第五節的討論。另見 Memo, Hoover to Dulles, re White House Meeting, April 1, 1955, same date, *FR1955-57*, 2:439-441。

⁹³ MD at the 240th NSC Meeting, March 10, 1955, *FR1955-57*, 2:348-349。杜勒斯說：「在中國當將軍的目的之一是可以被收買。」

⁹⁴ 例見 MC at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1, 1955, *FR1955-57*, 2:105。

⁹⁵ 所以艾森豪在寫信給他的朋友、議員與英相邱吉爾時，一直反駁建議放棄外島者，太低估國府士氣對整個太平洋島嶼防線的重要性。可例見 Letters, Ike to Churchill, March 22 and 29, 1955; Letter, Ike to Douglas, March 29, 1955; all in *FR1955-57*, 2:418n2, 419, 422。另見 MC of Bipartisan Congressional Luncheon Meeting, March 30, 1955, *ibid.*, pp. 427-428。

⁹⁶ Memo, Bowie to Dulles, March 28, 1955, box 64, f: China TS, 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PPS Records), RG 59, NA。

⁹⁷ Tel.671 from Taipei, March 30, 1955, 793.00/3-3055, RG 59, NA。國務院將此報告摘要給杜勒斯，見 Memo, Scott to Dulles, re Summary of Taipei Tel.671, March 31, 1955, *FR1955-57*, 2:434。

們可能願意以「反攻」的希望，來交換在臺灣的安全。換句話說，不能反攻對國府高層影響最大，但這些人反共意志也最堅強，因此放棄外島不致影響國府對臺灣的控制力。⁹⁸

有了這樣的理論與報告，艾森豪與杜勒斯從3月底開始到4月初，即放心構思新策略，基本上決定以增加美國軍援，甚至協同封鎖溫州至汕頭間海岸的條件，換取國府從外島減防或撤防。⁹⁹此種思考方向首先由艾森豪在4月1日的白宮會議中提出，指出解決外島困境最好的辦法，是派蔣信得過的人去說服蔣自動放棄金馬，在臺灣紮根等待中共瓦解，同時對中共施加心理與軍事雙方面的壓力。¹⁰⁰艾森豪與杜勒斯各自起草了用來說服國府的說辭，再經由國務院彙整、修改，重點在討論將國府及美國威望與外島掛鉤的不智、國府對外島減防或撤守在國際上可能贏得的利益，以及美國所願意提供的誘因；雖然也討論到反攻問題，卻未有縝密的思考。¹⁰¹

對整個反攻問題的立論，還是圍繞在「待機反攻」上。艾森豪這回主張在勸蔣對外島減防的同時，加速協助將臺灣本島國軍集中、裝備與訓練，讓國軍可以支援外島，同時讓這些部隊變成「待機（而動）的武器(a weapon of opportunity)」，準備當大陸上的政治、軍事與經濟發展讓反攻有「合理成功的機會」時，隨時把握時機進攻。¹⁰²杜勒斯則將反攻的「時機」，明確定義為「中共內部分裂、大陸內部因經濟或其他困境而發生大規模叛亂、因中共攻擊臺灣的反擊導致中共失去對大陸全部或重要部分的控制、中共攻擊其他地區導致遠東地區的大戰」等時候。他認為這些情況遲早一定會發生，在任一種情況下，有充分準備的自由中國政府即可趁機而動，從廈門以南或福州以北登陸，所以金馬對反攻而言沒有必要性。¹⁰³

⁹⁸ Desp.481 from Taipei, re U.S. China Policy and Offshore Islands, April 5, 1955, 793.00/4-555, RG 59, NA.

⁹⁹ 詳細內容與轉折，見張淑雅，〈金馬撤軍？〉一文第六節之討論。

¹⁰⁰ Memo, Hoover to Dulles, re White House Meeting, April 1, 1955, *FR1955-57*, 2:440.

¹⁰¹ 杜勒斯較注重討論整個反攻問題，艾森豪的草稿則只注意外島問題。

¹⁰² Memo, Ike to Dulles, April 5, 1955, *FR1955-57*, 2:448-449.

¹⁰³ Statement by Dulles, April 8, 1955, *FR1955-57*, 2:455-463; Preliminary Draft of Possible

到4月中旬，美國國家情報評估對反攻與士氣關聯的評估，完全反映了艾、杜最新的想法。該評估指出，雖然國府的士氣一大部分靠反攻來維持，但他們實際上對返回大陸的期望已經不高。至少在1952年時，部分國府官員即已私下承認，除非大戰爆發，反攻大陸的希望微乎其微。國府雖無在臺長治久安的打算，但已採行部分政策，調適在臺長時居留，只是絕不可能讓他們公開接受任何隱含失去大陸主權的解決方案。蔣本人是反攻政策的化身，他個人的意志是支持反攻信念的最大力量，因此失去反攻的希望會嚴重損害蔣的威望，但還不致讓他喪失對臺灣的控制。國府會極力抗拒放棄外島，因為這會減少美國與中共衝突的機會，也會削弱他們早日反攻的希望，不過只要美國堅持防衛臺灣，外島棄守並不會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¹⁰⁴換句話說，美國已經開始相信只要華府持續協防臺灣，就算失去外島和反攻大陸的希望，國府也不至於崩潰，導致讓中共接管臺灣的後果。

在此同時，情報顯示中共正加速擴建機場，並經由海運輸入、儲存大量油料，美軍顧問團長、太平洋區防衛司令與藍欽大使都建議華府准許國府攻擊這些機場，否則一旦中共完成集結準備，要有效阻止中共攻臺，只能靠美方以核武介入。¹⁰⁵這種新的危機氣氛，加強了華府決策者放棄金馬的決心，因而重新擬定對國府的說詞，除增加軍事與政治誘因之外，完全未討論國府反攻政策及金馬在此政策中所扮演角色的問題。¹⁰⁶華府派了勞勃森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Arthur Radford)為特使，到臺北去誘使蔣從金馬撤軍，但馬上遭到蔣嚴辭峻拒，當然也未及提到反攻問題。¹⁰⁷且在勞、雷與蔣

Statement of Position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7, 1955, f: Position Paper on Offshore Islands 1955 (4), box 2, White House Memorandum Series (WHMS), Dulles Papers, DDEL.

¹⁰⁴ NIE 100-4/1-55, re: Morale on Taiwan, April 16, 1955, *FR1955-57*, 2:479-489.

¹⁰⁵ 080814Z, Chase to Stump, April 8, 1955; 082103Z, Stump to Carney, same date; 090359Z, Stump to Carney, April 9, 1955; all in *FR1955-57*, 2:465-466, 471n2, 471-473.

¹⁰⁶ Statement of Posi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fense of Formosa, April 17, 1955, *FR1955-57*, 2:493-495.

¹⁰⁷ 根據國府保存的談話紀錄，蔣強調當時金馬的象徵意義甚至大於大陸，所以不可能放棄。蔣還說很多人以為他希望爆發大戰，以便可以反攻。他要兩位特使轉告艾森豪他絕

展開會談的前一天，中共總理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中，宣佈願與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¹⁰⁸第一次臺海危機至此落幕。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華府「待機反攻」的構想未經深思熟慮，只是爲了因應危機、並勸國府不要固守外島所想出來的說詞，「外交辭令」的成份高於策略設計。當時艾森豪與杜勒斯覺得國府必須放棄外島，或者不要將其威望與是否能守住外島掛鉤，才能解決危機。將此與推托防約時有關反攻的說詞比較，可知中共的文攻武嚇已經達到嚇阻美國、迫使美國改變立場與政策的目的。既然要求國府改變反攻政策並不是美國的主要目標，外島危機結束之後，華府也未積極強迫國府改變反攻政策。

其實華府「待機反攻」的想法，與國府立場差異並不大。蔣介石早在砲戰爆發之初，即清清楚楚地告訴杜勒斯：只有在有把握時，國府才會反攻。但杜勒斯似乎沒有聽到，美國還是認定國府守外島是爲了反攻，也擔心蔣會設法擴大與中共的衝突、趁機反攻，因此才有爲外島的許多擔心，以及勸國府要重新定位反攻政策、靜待時機。危機過後，美國所提及有關「反攻」的各項理論說詞，並未削弱國府反攻的信念，反而加強了其原有的「待機反攻」想法。

從第一次臺海危機結束後到第二次臺海危機（即八二三砲戰）爆發前，美國並未堅持國府從金馬撤軍或減防。至於「反攻大陸」，美國仍持續關心國府是否會輕舉妄動，因此駐臺北大使館與情報機構，不斷觀察國府的動靜，並預測國府是否會採取行動。基本上，美國認爲國府雖然不斷宣稱要反

無此種期望，因爲還有許多方法可以從共黨手中拯救大陸人民。他提到從雅爾達密約到馬歇爾調停，國府信任美國的判斷，換來的卻是連串的退讓終致大陸淪陷，有些人可能覺得他還信任美國是件奇怪的事，但他從未喪失對美國的信心，也相信美國希望見到一個自由的中國政府重掌大陸的政權。見 Minutes of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nd Robertson and Radford, April 24 and 26, 1955, 407.1 總統談話紀錄函件，外交部。

¹⁰⁸ 周恩來，〈在參加亞非會議的八國代表團團長會議上就臺灣地區局勢發表的聲明〉，1955年4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文件集》，第3集《1954-195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頁252-253。

攻，但其目的在維持士氣，不會主動進攻大陸。¹⁰⁹而在缺乏危機壓力的情況下，艾森豪再度回復國府士氣全靠反攻的信念支撐的老想法，因此認為不能明白告知國府美國認為其反攻無望，以免國府士氣崩潰，導致臺灣及其他東亞反共據點相繼失陷的後果。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經過辯論後接受這個想法，但決定給國府的軍經援助將避免提供可能支援反攻的物資。¹¹⁰換句話說，華府持續其模糊的「待機反攻」立場，未深入思考以釐清或解決這個問題，也未再敦促國府重新思考其定位與反攻的問題。

另一方面，蔣介石卻密切地注意美國所強調的「反攻時機」，並認為這種「時機」是可以主動創造的，因此國府不斷蒐集大陸人民對中共不滿的情報，也積極準備「反攻」。舉凡大陸內部發生問題，或國際局勢產生變化時，國府都會想說服美國支持其「趁機」反攻。華府則採取消極的態度，不斷地抗拒國府各種行動的提議。例如杜勒斯在 1958 年 3 月間訪臺時對蔣說：「時機」雖然存在，但雙方對「時機到臨」的評估可能不同；國府必須在「真正的」、而非「虛幻的」時機行動，才不會將資源零碎地浪費掉。¹¹¹蔣與美國訪客的談話中，則清楚反映出他對遲遲未能反攻導致國府士氣低落的焦慮。¹¹²雖然國府官員公開宣稱「反攻大陸」的頻率，似乎有降低的趨勢，¹¹³但蔣介石所感受到的壓力，在 1958 年春夏間，也就是八二三砲戰前夕達到高峰。¹¹⁴

¹⁰⁹ 例見 Memo, McConaughy to Sebald, re: Summary of Embassy Taipei Despatch of Particular Interest: "Return to the Mainland Thesis," March 22, 1957; SNIE 43-57, Likelihood of Military Ac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9, 1957; all in *FR1955-57*, 3:510-512, 515-518.

¹¹⁰ MD at the 338th NSC Meeting, October 2, 1957, *FR1955-57*, 3:611-619.

¹¹¹ MC, Dulles and Chiang et al., March 14, 1958, *FR1958-60*, 19:11.

¹¹²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 MC, Chiang with Radford, August 1, 1956, *FR195-57*, 3:411-415. 另外可見 1955 到 1958 年間，蔣與艾森豪的通信，以及他與杜勒斯、藍欽及其他美國高層官員的談話。

¹¹³ Dersp.402 from Taipei, re Quarterly Political Review, October-December 1957, January 23, 1958, 793.00/1-2358, RG 59, NA.

¹¹⁴ 莊萊德大使報告說蔣對美國透過防約不斷控制他的行動頗感挫折，而沒有行動也大大傷害蔣的威信；蔣當時相信大陸人民不滿的情緒已經成熟到叛亂的邊緣了。莊萊德因此建議華府考慮支持小型的滲透活動，讓蔣與國府有個目標，以維持他們的士氣。見 *Desp.581*

美方因而認為當時對臺灣最大的威脅是士氣問題，甚至覺得蔣變得非常急躁，擔心他會主動對大陸發動攻擊。¹¹⁵

四、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

第二次臺海危機始於 1958 年 8 月 23 日中共砲擊金門，終於當年 10 月 25 日中共宣佈「單打雙不打」的砲擊政策，此即臺灣所熟知的「八二三砲戰」。砲戰期間經過中共封鎖金門，美方協助國府突破封鎖，中共於 10 月初片面宣佈停火一週，期滿後再延兩週，卻在杜勒斯訪臺期間恢復砲擊等事件。此次危機為時較第一次短，危機氣氛卻比第一次有過之而無不及，是研究冷戰與核武遏止政策者經常討論的題目。¹¹⁶以下分美國對外島與反攻關係的檢討、杜勒斯訪臺造成國府宣佈不藉武力反攻，以及美國對不藉武力反攻的宣傳等三部分，來討論此次危機期間，美國對「反攻大陸」想法的轉變。

（一）外島與反攻大陸

八二三砲戰爆發後的危機高峰期，中美雙方對於「反攻大陸」的看法相差並不遠，基本上還是維持「待機反攻」的立場。例如國家安全特別助理葛雷(Gordon Gray)覺得國府完全不可能反攻，美國不該再讓蔣產生錯覺，認為有朝一日美國會支持他以武力返回大陸。艾森豪卻認為將來中共有可能從內部垮臺，到時美國願意協助蔣返回大陸，收拾混亂的局面；這與國府主動攻擊的武力反攻不同，而只要這種可能性存在，維持國府的士氣就很重要。¹¹⁷

from Taipei, April 3, 1958, *FR1958-60*, 19:12-15.

¹¹⁵ Tel.150 from Taipei, August 7, 1958, 793.00/8-758. RG 59, NA; Editorial Note (EN) on the 375th NSC Meeting, August 7, 1958, *FR1958-60*, 19:43.

¹¹⁶ 例如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Appu K. Soman, *Double-Edged Sword: 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1958*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0)。較早期的相關研究，可見張淑雅，〈安理會停火案〉一文中附註 1 至附註 6 中所列。

¹¹⁷ MR on the meeting of September 10, September 12, 1958, f: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1958 (3), box 6, Special Assistant-Presidential, NSA Series, White House Office File, DDEL.

遠東助理國務卿勞勃森也向葉公超闡明：中華民國是全球華人在中共政權外的唯一選擇，必須準備好在中共將來崩潰時取代之。¹¹⁸杜勒斯甚至公開說：雖然國府很難自力反攻，但若大陸發展出 1956 年匈牙利式的抗暴，就不能完全排除國府藉機返回大陸的可能。¹¹⁹另一方面，葉公超向華府高層指出國府並沒有攻擊大陸的計畫，而且「只要大陸人民不歡迎國府，國府不會返回大陸」，但國府仍須作充分準備，以備萬一大陸上有大規模抗暴發生，到時國府至少有義務幫助這些反抗中共的同胞；¹²⁰陳誠也向莊萊德說國府並不算發動戰爭來推翻中共，而是要藉中共內部反抗的機會，透過政治方法贏取對中共不滿者的信任。¹²¹但是國府亦強調只要「時機成熟」，防約和其他與美國的協定、諒解都不會是反攻的束縛。¹²²

在同意國府原則上應「待機反攻」的前提下，中美雙方對外島與反攻關係的看法，卻有很大的歧異。葉公超向美方高層指出，外島在「待機反攻」下所能起的作用不大；¹²³他們也從未被當作是「進攻大陸的踏腳石」。¹²⁴其實早在 1955 年春天，蔣拒絕放棄金馬時，已經向美方解釋的很清楚：主動

在另一個場合，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丁寧(Nathan F. Twining)說他懷疑蔣真的相信他有可能返回大陸，艾森豪說：「他必須讓他的人民相信多少有這種可能。」見 MC, Eisenhower with Twining and Goodpaster, September 29, 1958, *FR1958-60*, 19:297.

¹¹⁸ Tel.255 to Taipei, September 21, 1958, *FR1958-60*, 19:254. 葉公超對此談話的報告見第 856 號電，葉大使致外交部，民國 47 年 9 月 21 日，405.21 美匪會談卷(三)，外交部。

¹¹⁹ Press Conference of Dulles on September 30, 1958, print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October 20, 1958): 597-604.

¹²⁰ MC, Herter with Yeh, re: Warsaw Talks, September 17, 1958, f: September 1-22, 1958, box 10, the Secretary's and Undersecretary's 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s, 1953-1960 (JFDMC), NA; MC, Yeh with Corrigan, September 30, 1958, 793.00/9-3058, RG 59, NA.

¹²¹ Tel.501 from Taipei, September 30, 1958, *FR1958-60*, 19:300.

¹²² Tel.449 from Taipei, September 19, 1958, 793.00/9-1958, RG 59, NA.

¹²³ MC, Herter with Yeh, re: Warsaw Talks, September 17, 1958, f: September 1-22, 1958, box 10, JFDMC, NA.

¹²⁴ MC, Murphy with Yeh, re: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September 19, 1958, 793.00/9-1958, RG 59, NA; MC, Wilcox with Yeh, re: Offshore Islands, September 23, 1958, 793.00/9-2358, RG 59, NA. 不過駐美大使館報告說：臺灣民衆，尤其是外省人，卻把金馬外島當作反攻的象徵。見 Tel.449 from Taipei, September 19, 1958, 793.00/9-1958, RG 59, NA.

放棄金馬會嚴重斷傷他個人的威望，關係到他能否繼續領導臺灣，¹²⁵並不是爲了要反攻。當此次危機愈演愈烈，國際間呼籲國府放棄外島的呼聲愈來愈高時，蔣介石終於在記者會上反覆強調：「今日的金馬，只是臺海的屏障，而不是我們反攻大陸的基地。」¹²⁶儘管如此，美國決策者一直覺得蔣不肯放棄金馬是爲了「反攻大陸」，要將其當作「反攻跳板」；不少人，甚至包括負責臺灣地區安全的美國軍方人士，更是認定挑起大戰是蔣唯一返回大陸的希望，故國府很可能會藉機擴大衝突。¹²⁷艾森豪個人清楚表示：擁有金馬對反攻沒有幫助，故國府在金馬駐重兵是「非常可笑的(ridiculous)」；¹²⁸杜勒斯也認爲外島沒多大用處。¹²⁹

在此期間，美國接續了 1955 年臺海危機的思惟，希望能儘快從外島的困境中脫身，而脫身的辦法，一方面是限制國府的軍事行動，另一方面則是要國府撤出造成危機的金馬外島。砲戰一爆發，美國馬上又如 1954 年九三砲戰後一樣，開始注意並約束國府對大陸的攻擊性行動。¹³⁰根據美軍顧問團的報告，國府從金馬外島對大陸的軍事行動包括游擊、滲透、空投、宣傳

¹²⁵ 蔣強調寧可戰敗丟失金馬，也不能自動放棄，因爲若在幾翻誓言死守金馬之後又主動棄守，他將無以面對人民，也無法繼續領導國府。葉公超也說了同樣的話。Msg No.4, Robertson to Dulles, April 25, 1955, *FR1955-57*, 2:513-5.

¹²⁶ 〈總統九月二十九日中外記者招待會談話實錄〉，民國 47 年 9 月 29 日，707.5 金馬戰局（二），外交部；另見《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9 月 30 日頭版頭條。

¹²⁷ EN on Conference between Eisenhower, Dulles, and McElroy, September 11, 1958; EN on TC between Eisenhower and Dulles, September 16, 1958, *FR1958-60*, 19:161, 196; 220101Z, CINCPAC to JCS, September 22, 1958, *FR1958-60*, 19:255. 當然這是對國府的動機作最壞的判斷，英國駐淡水領事也認爲：只要美國一放鬆約束，國府馬上會挑動中共攻擊臺灣，見 Letter from Veitch (Tamsui) to Lloyd, September 23, 1958, FCN1193/359, FO371/133536, PRO.

¹²⁸ Tel.1071 from British UN Delegation to Foreign Office (FO), September 21, 1958, FCN1193/250, FO371/133532, PRO.

¹²⁹ 杜勒斯認爲因爲外島的位置以及中共在外島對岸駐以重兵，外島無法作爲對大陸的游擊或滲透基地，更甯提作爲進攻大陸的基地。見 Draft Talking Paper Prepared by Dulles, October 13, 1958, *FR1958-60*, 19:400.

¹³⁰ Memo, Howe to Dulles, re Acti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Mainland from the Offshore Islands, September 11, 1958, 793.00/9-1158, RG 59, NA.

等。¹³¹杜勒斯認為要求中共不要染指臺澎是一回事，要他們對國府從外島發動的攻擊騷擾保持緘默，則完全不合理。他認為對大陸保持行動雖有助於維持國府的士氣，但實際效果有限；他也覺得任何外力都難以改變中共或其他共黨國家。¹³²因此，杜勒斯建議停止國府所有對大陸的軍事行動以及美方的空中偵查，並限制美方的補給護航，也希望與中共透過談判解決危機。至於艾森豪則私下表示願意放棄所有外島，¹³³甚至願意多幫助國府訓練傘兵，或者協助訓練國軍兩棲登陸，讓其更具「行動力」，以便國府不必靠外島「反攻」，也就是可以撤出外島。¹³⁴艾森豪這條思路，變成華府處理危機的主線：即勸蔣放棄外島，並以協助增強國軍兩棲登陸訓練裝備為誘因。¹³⁵

到9月底，中美雙方有關外島撤軍減防的想法終於正面交鋒。先是蔣介石在9月29日的記者會中，說明國府自1949年古寧頭戰役之後即在金門駐紮重兵，這一點美國是「贊成的」，此後並未增加很多兵力。金門不是反攻的跳板，而是屏障臺海、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的自由光明燈塔。至於停火，蔣認為美國越渴望停火，中共就越拿翹，還會宣揚打算擴張戰事來「威脅、敲詐、勒索」。¹³⁶第二天，杜勒斯即在記者會中表示，美國並未「贊成」國府在金馬駐重兵，只是「默認」了這樣的事實：美國曾經要求國府減少駐軍，

¹³¹ Tel.357 from Taipei, September 10, 1958, *FR1958-60*, 19:MF105. 不過葉公超宣稱國府並未使用外島作為對大陸軍事行動的根據地，空投宣傳單或食米的飛機是從臺灣基地起飛的。見 MC, Herter with Yeh, re: Warsaw Talks, September 17, 1958, f: September 1-22, 1958, box 10, JFDMC, NA. 到10月初中共宣佈第一次停火時，美國也承認國府不再從外島向大陸從事任何挑釁活動。見 MC, Dulles with DOD-CIA, October 10, 1958, *FR1958-60*, 19:371.

¹³² Memo, Dulles to Robertson and Herter, August 23, 1958, *FR1958-60*, 19:689-70.

¹³³ Tel.307 from Taipei, September 4, 1958, 793.00/9-458, RG 59, NA; EN on a conference between Eisenhower, Dulles, and McElroy, September 11, 1958, *FR1958-60*, 19:161; MC, Eisenhower with Dulles, September 11, 1958, *FR1958-60*, 19:161-163.

¹³⁴ EN on MC between Eisenhower and Dulles, September 16, 1958, *FR1958-60*, 19:196-197.

¹³⁵ 艾森豪在9月16日、9月22日、10月2日與杜勒斯打電話時，不斷提到這個想法，見 *FR1958-60*, 19:346n1; MC, Eisenhower with Twining and Goodpaster, September 29, 1958, *FR1958-60*, 19:296.

¹³⁶ 〈總統九月二十九日中外記者招待會談話實錄〉，民國47年9月29日，707.5 金馬戰局（二），外交部。

將外島視為前哨站；雙方意見雖不相同，但經常有密切的討論，若有必要，一定可以找到彼此都可接受的辦法。杜勒斯說他不贊成在中共的砲火下自金馬撤軍，以免嚴重斲傷國府的士氣；但若能獲致可靠的停火，繼續在金馬駐紮這麼多軍隊實在很「愚蠢(foolish,《中央日報》翻譯成「不智之舉」)」。當記者追問美國是否期望國府反攻，或是否曾經承諾幫助反攻時，杜勒斯指出國府自己無法反攻，美國也沒有承諾要協助國府反攻。至於大陸內部發展出的反抗運動，杜勒斯認為可能會由當地人領導，即或爭取外界的協助，也很難預測蔣是否可以就此返回大陸、重掌政權——雖然這個可能性不是不存在。¹³⁷

杜勒斯對於外島與反攻這樣的看法，被新聞界大肆渲染，造成臺灣內部嚴重的「不安、焦慮與動搖(uncertainty, uneasiness, and unsettlement)」。¹³⁸蔣因而召見莊萊德大使，以「異常嚴重的語氣」強調杜勒斯的說法對臺灣，尤其是金馬守軍士氣，所造成的傷害，也說「任何外在的壓力或武器，甚至核子彈，都無法強迫國府從外島撤退一個士兵；國軍會在外島作戰到流乾最後一滴血為止。」蔣說他已經宣稱外島不是反攻的跳板，也不會要求美國派地面部隊協防外島，這是國府的「底線」，如果美國想超過這個底線，不能怪國府不合作。他要求美國迅速採取有效的辦法來彌補對國府士氣的傷害。¹³⁹但除了聲明外島政策未變，杜勒斯的說法只是被希望美國改變政策的新聞界炒作成重大政策變化之外，¹⁴⁰華府仍持續其放棄外島的思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討論杜勒斯 9 月 30 日記者會的談話時，認為美國的「底」是要中共答應不以武力解放臺灣，以換取外島的控制權與國府放棄「反攻」的承諾。毛澤東因此認為可以讓金馬留在國府手中當作「絞

¹³⁷ Press Conference of Dulles on September 30, 1958, print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October 20, 1958): 597-604.

¹³⁸ Tel.520 from Taipei, October 1, 1958, *FR1958-60*, 19:315n1.

¹³⁹ Tel.534 from Taipei, October 2, 1958, *FR1958-60*, 19:319; Desp.172 from Taipei, October 6, 1958, 793.00/10-658, RG 59, NA.

¹⁴⁰ Tel.290 to Taipei, October 1, 1958, *FR1958-60*, 19:315; Tel.534 from Taipei, October 2, 1958, *FR1958-60*, 19:319.

索」，以便與國府「保持接觸」，並作為對付美國的手段，需要緊張時就把絞索拉緊，讓國府與美國疲於奔命。在討論過美國可能的談判條件後，毛裁決要採取「打而不登、斷而不死」的策略，間歇砲擊金門。10月6日，中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佈〈告臺灣同胞書〉，宣佈暫停砲擊7天，但以沒有美國軍艦護航運補為條件。¹⁴¹當時中共對金門的封鎖已被突破，杜勒斯覺得中共或許認為攻佔金馬代價太高，打算改採外交手段；宣佈暫時停火是為了爭取時間，以便從容檢討外島情勢。¹⁴²艾森豪認為可以藉機建議國府從外島撤退，美國願意提供國府兩棲登陸設備與訓練做交換，讓蔣維持「反攻」能力，靜待中共內部發生動亂。¹⁴³

以下幾天，華府忙著內部溝通，設計可以誘使蔣放棄外島的方法，也在策劃的過程中，進一步推演了前此「待機反攻」的觀念，焦點則是要國府重新定義自己存在的價值。因為艾森豪不滿勞勃森與雷德福在1955年4月間到臺灣說服蔣介石時，未能盡力推銷將外島減防成為「前哨站」的觀念，¹⁴⁴故這回決定由杜勒斯親自出馬說服國府，說詞也主要由杜勒斯操刀，艾森豪並未像第一次危機時般地插手。杜勒斯甚至在離開華府後、抵達臺北前還不斷地絞盡腦汁、修改說詞，冀望能藉完美的理論與足夠的誘因，來說服國府合作。

¹⁴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中卷，頁177-178。

¹⁴² MC, Dulles with Yeh, re: Futuer Moves Regarding Offshore Island Situation, October 10, 1958, *FR1958-60*, 19:359.

¹⁴³ Memo, Eisenhower to Dulles, October 7, 1958, *FR1958-60*, 19:346-347. 艾森豪告訴英國蒙巴頓爵士(The First Sea Lord Mountbatten)他將以兩棲登陸能力為「胡蘿蔔」、宣稱除撤退外不再協助外島防禦作為「棍棒」，迫使蔣就範；當然還要聲明兩棲作戰能力只有在雙方同意時——也就是中共崩潰時——才可使用。見 Tel.2796 from British Embassy, October 17, 1958, FCN1193/465, FO371/133541, PRO.

¹⁴⁴ MC, Ike with Dulles, April 25, 1955, *FR1955-57*, 2:519; Letter, Ike to Dulles, April 26, 1955, *ibid.*, pp. 522-523. 勞、雷二人訪臺的經過與檢討，可見張淑雅，〈金馬撤軍？〉，頁467-471的討論。

(二) 從待機反攻到精神反攻

首先，國務院、國防部與中情局在 10 月 10 日的聯合會議中，討論了誘使蔣放棄外島的構想。當時國防部認為有幾條路可走：維持現狀、將外島變成一個前哨站，即將兵力減少三分之二；國府宣佈「不用武力反攻」；或國府完全撤離外島，讓聯合國託管。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外島減防、並加強臺灣本島的軍事力量。當討論到「反攻大陸」時，杜勒斯認為國府仍可「待機反攻」。他舉 1956 年匈牙利反蘇暴動的例子，說明若當時有個「自由匈牙利政府」存在的話，抗暴結局可能完全不同。以此，若大陸爆發類似「匈牙利抗暴」的革命，國府就可以扮演較積極的角色。杜勒斯估計這種情況或許十年內就有可能發生，因此國府所需要的是機動性的軍力，而當大陸發生革命時，部隊在臺灣比在外島有更大的活動彈性。至於加強國府軍力，軍方覺得傘兵在大陸派不上大用場，因此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並未考慮蔣要求訓練三萬傘兵之事。副國防部長奎爾(Donald Quarles)則認為，加強國府兩棲作戰能力，違反了美國不支持國府反攻的立場。不過勞勃森覺得國府軍隊有兩棲作戰力，在中共攻擊韓國或其他地方時會有所幫助，海、空軍參謀首長基本上同意這種看法。¹⁴⁵換句話說，與會者對於可以提供給國府交換外島撤軍或減防的「誘因」並未作決定，而杜勒斯的思路也未像 1955 年 4 月間般地集中在「誘因」上，而是認真思考國府在冷戰的國際舞臺上所可以扮演的「角色」問題。¹⁴⁶

在撤退外島問題上，艾森豪認為除了誘因外，不妨施加壓力逼蔣就範；杜勒斯則不希望用最後通牒的形式逼蔣放棄金馬，而是希望能讓蔣從較寬廣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國府在未來幾年到底能扮演什麼角色？怎樣才能演好？¹⁴⁷杜勒斯的初步構想有幾個焦點：首先，在當時的局勢下，國府主要的

¹⁴⁵ MC, Dulles with DOD-CIA, October 10, 1958, *FR1958-60*, 19:363-371.

¹⁴⁶ TC, Dulles with Smith, f: Aug. 1-Oct. 31 1958 (2), TCS, box 2, Dulles Papers, DDEL.

¹⁴⁷ Tel.2796 from British Embassy, October 17, 1958, FCN1193/465, FO371/133541, PRO; Memo, Green to Robertson, re: Secretary's Comment on Purposes of Your Mission to Taiwan, October 17, 1958, *FR1958-60*, 19: MF(Micro Fich Supplement)236.

作用是在臺灣維持一個反共政府以抵禦共黨侵略，防止更多中國人（尤其是居住在亞洲地區的海外華人）被迫接受共黨暴政，或成爲共黨擴張的工具，且在聯合國代表中國。其次，當中共「軍方高級將領」有大規模不滿時，具有機動力的國府可以幫助這些異議份子，從而賦予革命「正當性 (legitimacy)」，並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與中共政權有鮮明的比對，以激勵內部革命機會的開展。在這段期間，國府可以「爲全世界保存被中共有計畫地壓抑與破壞的中國文化」，故應慎重考慮如何才能維持自己作爲「中國的象徵」的地位？就長期而言，國府要扮演好這些角色，必須先爭取國際支持。但是國際間對國府堅持死守外島頗覺不耐，有些國家甚至認爲臺灣是「和平的芒刺」，而非以往自由世界引以爲傲的模範。換句話說，國府因爲與世界潮流脫節，變得十分「短視」，嚴重損害了自己在國際間的地位；若非美國全力護持，國府早就遭遇重大外交挫敗，故蔣應該採取順應世界潮流的行動。¹⁴⁸這幾個想法中，「保存文化」是新的角度，而以「中共軍方高級將領有大規模的不滿時」，作爲反攻的「時機」，並以政、經、社會進步來激勵這種機會，一併深化了前此「待機反攻」的架構。

國務院政策規劃助理國務卿史密斯(Gerard C. Smith)掌握了杜勒斯有關國府應重新定義其角色的論點，進一步推演出整套「精神反攻」的想法。他指出國府在「反攻大陸」的使命下，已經將臺灣轉變成象徵偉大中國文明的「自由中國」。在蔣介石公開承認除非大陸發生革命，國府難以反攻後，需要一個新的任務來維持「自由中國」的存在，猶如早期基督徒將基督立即再臨的期望，轉換成較長久、精神性的信心。他認爲國府應該從現代的問題與條件出發，重新思考與改造中國傳統，以便給在大陸上幾乎窒息的「中國靈魂」創造一個未來。這條路有幾個優點：不僅外省人與臺灣人都可以認同並爲此目標奮鬥，藉機消彌彼此的歧見，海外華人與亞洲人也都會尊重一個能

¹⁴⁸ 這些想法來自兩個文件，一是 Draft Talking Paper by Dulles, October 13, 1958, *FR1958-60*, 19:399. 杜勒斯與其弟中情局長亞倫·杜勒斯討論此篇草稿時，認爲內容嫌「散漫 (scatterbrained)」，必須再斟酌。另一個文件是 Memo, Green to Robertson, re: Secretary's Comment on Purposes of Your mission to Taiwan, October 17, 1958, *FR1958-60*, 19:MF236.

夠調適夢想、適應現實的政府。表面上看來，中共很強盛，蔣只是個失敗者，但在精神方面，蔣其實佔優勢，長久之後會變成一個安定的因素，回歸世界潮流。史密斯認為若將「反攻」從具體的任務轉變為精神性的任務，加上蔣親自到聯合國宣佈從外島撤退，等於公開拔去「和平之芒刺」，定可成就蔣「瞬時的偉大(a moment of greatness)」。他指出很多「有創意的流亡者」，例如所羅門王、穆罕默德與孔子，都是在一段沈寂之後，才勝利地重返他們的舞臺，「自由中國」有朝一日也可藉著精神而非武力重返大陸。除非中共因內在矛盾而垮臺，久而久之它必須與自由世界共處，到時「自由中國的靈魂」會再度在大陸上找到歸宿——因為到時那些曾經痛飲馬克斯物質主義渣滓的人，會渴望更高層次的東西。¹⁴⁹杜勒斯對史密斯這篇「傑作」顯然非常讚賞，¹⁵⁰以下幾天訪臺說詞的準備工作，即從「保存文化」與「精神反攻」兩個角度下手。

要說服國府合作，先得讓他們了解為何必須重新思考其所扮演的角色。杜勒斯覺得可以指出幾點：一來，中共接管大陸已近十年，該是重新思索國府角色的時候了。再者，國際間或視中華民國為一個「內戰倖存的好武政權」，只有靠「武力反攻」、甚至挑起世界大戰才能生存，或認為國府必須承受三重壓力（中共威脅，越來越依賴不想拖長內戰的臺灣人，以及國際輿論渴望和平）故壽命有限，這些印象必須消除。三來，分裂國家如韓、越、德等都有穩定的停火，只有中國內戰沒有停火協定，中共隨時可以重啓外島戰端；而世界各國均渴望和平，故希望消除這些「衝突點」。當時除了南韓、南越外，美國是唯一全力支持中華民國的國家，但美國需要花很大工夫，才

¹⁴⁹ Memo, Smith to Dulles, re: Future Role of Free China, October 17, 1958, *FR1958-60*, 19:MF239.

¹⁵⁰ 杜勒斯在往臺北途中到倫敦與英國外相洛伊(Selwyn Lloyd)會談時，即引用史密斯所舉早期基督徒期待基督再臨的例子，認為蔣期待中共早早垮臺已屬不可能，他應該調適不同的狀況。見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Dulles and Lloyd, October 19, 1958*, FCN1193/477, FO371/133541, PRO; Memo, Borg to Savage, October 27, 1958, *FR1958-60*, 19:MF239. 杜勒斯在 10 月 22 日與蔣會談時，也強調了這個觀念。見 *MC, Dulles with Chiang et al., October 22, 1958, FR1958-60, 19:421-423.*

能說服其他國家不要承認中共，且無法保證以後美國政府像艾森豪——杜勒斯般地堅定支持國府。另一方面，「文化、中國傳統，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都是世界上所珍惜的。」中共在將中國人民變成國際共黨奴隸的過程中，已將中國傳統價值系統破壞無遺；「中華民國」有機會代表自由世界所珍視的「中國」。因此，國府唯有與美國合作、另闢蹊徑、改變其好武的形象，完成為「自由中國」代言的任務，才能避免覆亡。¹⁵¹至於「反攻大陸」，杜勒斯認為國府應視其為角色轉變的副產品，而不是迫切追求、視為唯一可以避免覆亡的目標。角色轉變的發展在歷史上不乏先例，例如基督徒盼望基督再臨；而這種進展是因應時勢，絕非退卻，反而是保持活力與避免覆亡的進步。¹⁵²

以上說詞是杜勒斯在旅途中所構思者，有些是到達臺北後才寫出，甚至與蔣談過話以後才改寫，以作為與蔣談話的藍本。其重心既非撤離外島的誘因，也不再強調「待機反攻」，而是在說服國府認清自己的能力與國際環境，自動自發改變國策，從以「武力」與共黨鬥爭的「解放者」，轉變成「中國文化守衛者」，以待來日「精神反攻」。

杜勒斯於 10 月 21 日抵達臺北，當天與蔣會談時，即依照擬定的說詞，闡明國府必須開創新角色的理由與新角色形塑的論點，重點放在國府必須消除世界輿論對其威脅和平的恐懼，以爭取國際支持與生存空間。蔣的回應是重述他的「反攻哲學」：即他不要世界大戰，而除非大陸人民採取行動反抗中共政權，反攻無法進行。他很遺憾美國，甚至艾森豪政府，對他不夠信任。¹⁵³當天晚上，杜勒斯將擬好的說詞再加工，放入更動聽的冷戰辭彙，整理成一份講稿，第二天早上與蔣會談時，讓葉公超逐段全文翻譯出來。這份

¹⁵¹ Drafts of Statement by Dulles, October 20, 1958, f: Chiang Kai-shek 1958, box 127, JFDP, ML; REAT MC-9, Talking Paper by Dulles, October 21, 1958, *FR1957-60*, 19:414-417.

¹⁵² REAT MC-9, Talking Paper by Dulles, re: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Free World, October 21, 1958; REAT MC-10a, Statement by Dulles left for Chiang Kai-shek, October 22, 1958; both in *FR1957-60*, 19:414-417, 421-423.

¹⁵³ MC, Dulles with Chiang, October 21, 1958; Dulte 2, Dulles to Eisenhower, same date; in *FR1958-60*, 19:418-419, 420.

說帖強調國際間認為國府好武，甚至「希望」破壞和平、將美國牽扯入與中共的大戰，以便達到「反攻大陸」的目標；除非國府採取行動糾正這種觀念，否則一定會輸掉這場國際政治戰爭。事實上，「共產與自由真正的戰場在人心，這是我們作戰的焦點，也是可以贏得戰爭的地方。」因此，國府應該讓世人明瞭「反攻的基地」不在強盛的軍力或外島，「而是在大陸六億中國人渴望從當前桎梏中解放的心靈」；而這些中國人唯一的希望是自由中國政府持續存在，並捍衛中國文化傳統，「讓世界上最大國家的自由之火得以不滅」。¹⁵⁴至於具體的做法，這份說帖指出消極方面有五：接受外島停火、強調除非受邀請不會以武力反攻、停止對大陸的各種挑釁活動、接受不會讓外島人民流離失所或被中共接管的外島解決方案、重新考慮外島駐軍數量以保存更大的機動性。此外，國府可以積極地將施政重點轉變為保存中國文化，找出凸顯自己是「中國文化守衛者」的辦法，與中共的物質主義相抗衡，藉以吸引大陸人民的羨慕與海外華人、甚至美國與自由世界的支持。¹⁵⁵

在讀完書面說帖後，杜勒斯呼籲國府聲明願意接受類似其他分裂國家有正式停火的情況，讓中共承擔破壞和平的責任。或許是為了讓國府更能接受這些想法，且表示美國並未放棄一貫勸國府要「待機反攻」的立場，杜勒斯聲明他不是要國府放棄解放大陸的任務，還舉 1956 年匈牙利抗暴的例子，認為當時若有個「自由匈牙利」在旁，抗暴應該會成功。同理，只要大陸發生「無可避免」的抗暴時，「自由中國」即可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但他再次強調如果中華民國希望作為「中國的象徵」，並取得國際支持，就必須讓人覺得它不會挑起世界大戰；若不趕快採取他所建議的步驟，很多自由世界國家會承認中共，導致其進入聯合國。¹⁵⁶杜勒斯這番說詞語帶威脅，實質上是以「愛好和平」之名，要求國府迎合國際輿論，單方面作大幅度的讓步。宣

¹⁵⁴ REAT MC-10a (Taiwan), Dulles with Chiang et al., 10:30a.m., October 22, 1958, *FR1958-60*, 19:424-425.

¹⁵⁵ REAT MC-10a (Taiwan), Dulles with Chiang et al., 10:30a.m., October 22, 1958, *FR1958-60*, 19:425-426.

¹⁵⁶ REAT MC-16 (Taiwan), Dulles with Chiang et al., 10:30a.m., October 22, 1958, *FR1958-60*, 19:423.

讀後，蔣要求暫時休會，讓國府思考美方的建議。

當天下午四點半，外交部長黃少谷先告訴莊萊德大使國府對杜勒斯說帖的初步想法。黃指出國府完全明瞭國際間對和平的渴望，甚至有「不惜代價追求和平」的傾向——尤其是當「代價」是由其他人來支付時。在中共主動挑釁與侵略的情況下，國府已經付出的代價包括：竭力自我約束不報復中共的砲擊，甚至宣稱外島不會作為反攻的跳板，國府也準備不反對「實際上」的停火。國府讓步已經到極限了，杜勒斯的提議基本上是要國府接受「兩個中國」，辜負所有中國人的期望，實足以動搖中華民國的「國本」。國府當然知道國際同情與支持的重要性，但中華民國的存在與未來，端靠視其為聚集反共力量，有朝一日可以回復中國自由民主的中國人；國府任何安於流亡的暗示，均會被視為放棄自由中國人民的最後希望，這無異於自殺。國府非常理解其國際地位的脆弱，不幸地是國府面對的是國際與國內支持的衝突，若兩者只能擇一，國府會毫不猶豫地接受失去國際支持的後果。至於文化方面，國府已經在做，日後還會加倍努力；不過國府最主要的關懷，必須是保存與強化其政權的基礎。¹⁵⁷也就是說，杜勒斯苦思兩週的理論與說詞，因完全未曾考慮國府的立場，只一味要求國府迎合國際輿論、配合美國利益，因此讓國府難以接受；國府官員只花了幾個鐘頭，就端出一樣漂亮的說詞，將杜勒斯的論點一一反駁。

或許國府覺得除了迎合國際輿論一點外，其他論點與其立場歧異並沒有那麼大，所以蔣介石與杜勒斯會談氣氛並未劍拔弩張，蔣也同意在會談結束後，發表一份聯合公報，宣示中美的團結。由美方提出的公報草稿共七段，經過重大修改的只有兩段。¹⁵⁸一是第二段有關金馬外島，依國府意思，加入「雙方咸認在當前情況之下，金門、馬祖與臺灣、澎湖在防衛上有密切之關

¹⁵⁷ REAT MC-16 (Taiwan), Drumright with Huang, 4:30p.m., October 22, 1958, *FR1958-60*, 19:428-429.

¹⁵⁸ 莊萊德 22 日下午將公報草稿交給黃少谷，當天晚上七點（即晚宴前）杜勒斯與蔣談話完全未討論公報具體內容問題，而是集中在如何應付中共打打停停戰略。飯後雙方略微討論了公報的問題，尤其是關鍵性的「非憑藉武力」一段。REAT MC-17, Dulles with Chiang et al., 7p.m., October 22, 1958, *FR1958-60*, 19:430-433.

連。」另一段是有關「使用武力」的第六段。美方原先的草稿說：中華民國政府「決不會發動戰爭來重新建立其在中國大陸的統治，除非爲了拯救在其統治下的人民，不會開戰。」此點等於主動宣稱放棄反攻，故蔣極力反對。國府建議改成「不會主動挑起世界大戰」，杜勒斯也不能接受。他建議改爲「中華民國政府反對其作爲自由中國代表的使命是戰爭使命」，並指出西德已經在 1954 年 10 月 3 日公開宣稱其「決不會採取武力來達到統一德國的目的」，國府應該效法此種宣示。國府還是認爲這種措詞不妥，最後依國府的意思，改爲「中華民國政府認爲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爲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¹⁵⁹美方很高興地接受了這段文字。〈中美聯合公報〉（中共稱爲〈蔣杜公報〉）於是在臺北時間 1958 年 10 月 23 日下午由雙方向新聞界公佈。

公報談判過程可能並沒有很激烈的爭辯。¹⁶⁰蔣介石將美方草稿有關金馬與臺澎防禦關係，以及不使用武力的部分重新改寫，然後就由葉公超、黃少谷、陳誠與杜勒斯及勞勃森花了一小時左右作內文細節討論。¹⁶¹杜勒斯認爲國府雖然原先並未想到發表「不使用武力」的聲明，但在充分討論過後，對這個主意並不排拒。¹⁶²從公報定稿後的談話紀錄顯示：蔣對公報並無不滿

¹⁵⁹ 公報內容協商過程中的各稿，見 MR by Greene,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MF251. 此備忘錄的重點摘要見 EN, *FR1958-60*, 19:440-441。公報中文全文刊載在《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10 月 24 日頭版頭條。中英文全文均收於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頁 172-174。

¹⁶⁰ 這是閱讀美方保存的談話紀錄所得到的印象，但是會談期間，英、法各大報紙均報導蔣、杜間發生了「嚴重歧見」，見央密參(47)第 1690、1704 號，民國 47 年 10 月 23、24 日，412 蔣總統與杜勒斯臺北會談，外交部。這種報導可能是因爲各國大多認爲會談主題是削減金門守軍，預料會遭到蔣強力反對，故作此推測。另一方面，中共新華社則認爲公報是「經過長時間討價還價之一種產物」，用以向世人掩飾美國與國府間存在的分裂。央密參(47)第 1709 號，民國 47 年 10 月 24 日，同上。

¹⁶¹ REAT MC-14 (Taiwan), Dulles with Yeh et al., 10:30a.m.,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438。國府的談話紀錄收在 407.1 總統談話資料暨有關函件（三），外交部。

¹⁶² 這是杜勒斯私下對美國記者講的，見 TOUS183 from Taipei to USIA,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MF252。

的表示，也未如勞勃森、雷德福在 1955 年 4 月勸他放棄金馬般地大發雷霆。他甚至還向杜勒斯建議：「今後雙方宣傳亦應大致照聯合公報之方針進行」。在此會談中，蔣與杜勒斯雖然對金馬能否固守，意見相左，但原則上同意以縮減外島部隊換取美方提供較高性能的武器，只是強調在砲戰期間不宜減防。看來蔣當時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應付中共「打打停停」的策略，因為中共這種戰術對金門士氣與臺灣社會經濟的傷害，遠超過激烈的作戰。¹⁶³

日後發展不論，仔細檢查公報的內容，也可推測為何蔣當時同意發表這份公報。首先，公報明言金馬與臺澎在防衛上有密切關連，而根據 1955 年 1 月美國國會通過的〈臺灣決議案〉，美國總統只要判定中共的攻擊危及臺澎，即可出兵協助防衛。國府可能認為此條影射美國將出兵協防金馬，可以振奮因中共打打停停戰略而顯得消沈的士氣。接著，公報中明言中共的「新侵略行動及其宣傳攻勢，並未如其所預期而分化中、美兩國，且反而促使中、美間之合作更臻密切。」蓋自八二三砲戰爆發以來，華府高層幾次政策聲明中，對於是否防衛外島，立場均相當曖昧，尤其是杜勒斯在 9 月 30 日記者會中的說法，更被中共宣傳為「美國人總有一天會拋棄你們」，對臺灣軍民士氣的打擊非常大。而根據蔣與杜勒斯會談的內容來看，士氣顯然是蔣當時最擔心的問題，因此與美國「顯示出一條團結一致的陣線」是國府內定蔣杜會談的重要目標。¹⁶⁴故中美團結的宣示，對士氣應有很大的幫助，國府也以

¹⁶³ 蔣介石杜勒斯談話紀錄，民國 47 年 10 月 23 日，407.1 總統談話資料（三），外交部。美方所作的談話紀錄內容與此類似，同樣未顯示蔣對公報內容有所不滿，見 REAT MC-15, Dulles with Chiang and Yeh,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438-440。但沈劍虹十幾年後回憶到：在討論公報時，他在外面等，看到「而非憑藉武力」時覺得不妥，寫字條請葉公超注意修改，但雙方簽字時未改，「第二天各報議論紛紛，群相揣測以為我政府武力光復大陸的決心，已經改變了。」第二天蔣看了中文公報後，發覺措詞與原意似有出入，葉公超向蔣解釋，出來後面色凝重，沈劍虹認為這是蔣對葉信心動搖的前奏。這樣的說法當然難免有「後見之明」的嫌疑，只是國府決策過程紀錄至今無法全見，外交部也只有與美方紀錄同樣場次、內容類似的談話紀錄，無法確知蔣對公報內容在發佈前是否有強烈的抗拒，也無法驗證沈劍虹說法的正確性。見沈劍虹，〈我從來沒有叫過他一聲「喬治」〉，收入秦賢次編輯，《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頁 127。

¹⁶⁴ 國民黨內部早就預定「蔣總統和杜勒斯的談話，將會產生一項表示團結一致的聯合聲

公報「對鞏固中美團結有重大意義」作為宣傳的重點。¹⁶⁵更何況公報中還言明「美國確認中華民國為自由的中國之真正代表，並為億萬中國人民之希望與意願之真正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方面以能真正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為宗旨，並為保持使中國人民能對人類福祉作巨大貢獻之本質與特性，而奮鬥到底」；也接受「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是國府的「神聖使命」，這等於美國再次正式聲明支持國府的「正統」地位，甚至承認其「反攻大陸」的正當性，迥異於以往不願與國府反攻政策掛鉤的立場，意義非凡。¹⁶⁶換句話說，在杜勒斯眼中可能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美麗外交辭令，從國府立場來看卻有助維持其政權的正當性和鞏固美國的協助，因此才是真正的「實惠」。

至於被批評為放棄軍事反攻或放棄對大陸使用武力一點，蔣可能認為已經爭取到刪去美方原稿上「決不自行發動戰爭」的字眼，換上反攻「主要途徑」「非憑藉武力」的說詞；他當時還告訴杜勒斯「從未認為收復大陸乃一純軍事性之行動」，而當年他北伐時即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¹⁶⁷其實國府對於反攻不靠軍事早有宣示。例如當年4月間，蔣介石在接受美國記者魯卡斯(Jim Lucas)訪問時，即強調國府反攻是「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以臺灣的進步作為大陸人民希望的燈塔。到5月初，蔣又告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記者：與中共的鬥爭不是軍事鬥爭，而是解放的革命，國府打算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力量來達到目標。「換句話說，我們從事鬥爭的力量，是以人民反抗共匪殘害的意志和力量為基本。」¹⁶⁸而公報發表幾週前《中央日報》刊載蔣9月29日的記者會內容時，即以「大陸整個民心向背，

明」，故公報中所顯示的「中美團結」一點，就大致符合國府的目標。見《宣傳週報》，12:17（民國47年10月24日），頁2。

¹⁶⁵ 宣傳通報第255號，民國47年10月23日發，收入《宣傳週報》，12:18（民國47年10月31日），頁1。

¹⁶⁶ 至於將反攻比喻為「基督再臨」一點，雖然蔣介石是基督徒，但因缺乏資料，無法判定這個說詞對蔣是否有任何影響。

¹⁶⁷ 蔣介石杜勒斯談話紀錄，民國47年10月23日，407.1 總統談話資料（三），外交部。

¹⁶⁸ 蔣的訪談紀錄，收於《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民國73年），卷39，頁102, 109。

爲我反攻主要條件」爲標題。¹⁶⁹可見蔣當時確實認爲「不憑藉武力反攻」只是重述國府一向宣稱的原則，而非重大政策改變。更何況比起杜勒斯一開始對國府的五項要求，即接受外島停火、減防、宣佈不以武力反攻、停止對大陸騷擾活動，甚至接受外島非軍事化等，公報內容顯然正面得多。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府認爲只是重述其立場的「不憑藉武力」部分，杜勒斯卻認爲是整個公報的「靈魂」，是「新的公開聲明」，¹⁷⁰也是美國以外交辭令所換得的「實質」。因此杜勒斯雖未達到讓外島撤退或減防或最初目標，但認爲臺北之行「極度具有建設性」，¹⁷¹因爲公報所觸及的是「根本問題」，相較之下，外島減防只是「細節而已」。¹⁷²他向艾森豪報告說：由於中共恢復砲擊，所以馬上從外島減防不太實際，但蔣答應在金門砲火止息後，撤出一萬五至兩萬的外島部隊。他相信只要能安排停戰，「要讓國府在外島駐軍性格大幅改變」，甚至到「非軍事化」，都不會很困難。¹⁷³「最重要的是在公報中，國民黨宣佈要透過政治手段，而非使用武力來解放中國大陸。」¹⁷⁴艾森豪因此致函蔣介石，說他「全力支持」，〈中美聯合公報〉，因爲公報除了表示中美團結外，有關反攻主要不憑藉武力的聲明更是遵循自由世界的願望，「也顯示了我們與共黨最大的差異」。¹⁷⁵

查考美國提倡「放棄使用武力」觀念的歷史，就不難了解爲何杜勒斯這麼滿意公報的結果。這個概念最早是杜勒斯在大陳撤退後提出的，當時因爲

¹⁶⁹ 見《中央日報》，民國47年9月30日，1版。

¹⁷⁰ 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erence of October 2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7, 1958): 770. 中文譯本見《中央日報》，民國47年10月30日，2版。

¹⁷¹ MC, Robertson with Australian Ambassador Howard Beale et al., re: Taiwan Straits, October 24, 1958, 793.00/10-2458, RG 59, NA.

¹⁷² Statement by Dulles at the Andrews Air Force Base, October 24, 1958, f: Chiang Kai-shek, box 127, JFDP, ML.

¹⁷³ MC, Dulles with Eisenhower, October 24, 1958; MD at the 384th NSC meeting, October 30, 1958; both in *FR1958-60*, 19:445, 471.

¹⁷⁴ Dulte 7, Dulles to Eisenhower,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444.

¹⁷⁵ Message (Tel.384 to Taipei), Eisenhower to Chiang Kai-shek, October 24, 1958, 793.00/10-2458, RG 59, NA.

中共聲明攻擊外島只是達到解放臺澎的手段，致使美國不得不介入外島防禦，而美國目的在保住臺澎，並不是要防衛外島，故杜勒斯向一直勸華府放棄外島的英國指出：只要中共能宣稱放棄「以武力解放」臺灣，美國即願意改變對外島的政策。¹⁷⁶英國外相艾登試探中共是否願意私下或公開表示不打算使用武力來行使對臺澎的主權，中共拒絕。¹⁷⁷危機過後，美國爲了避免臺海問題擴大成無法解決的全球衝突，故與中共進行大使級會談，並於 1955 年 9 月 20 日進入「實質問題」討論階段。當時美方提出雙方在臺海地區「放棄使用武力」的協議草案，認爲這是最重要的實質議題。但中共堅持「中國人民願意使用什麼方式解放臺灣，這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無權干涉」，¹⁷⁸中共只願意談在其他地區不使用武力。故至第二次臺海危機爆發爲止，雙方對「放棄使用武力」的條文一直無法達成協議，大使級談判也因此一直陷入膠著。¹⁷⁹在此期間，美國也屢勸國府不要打算用武力解放大陸。¹⁸⁰站在美國立場來看，國府單方面宣稱不憑藉武力反攻，一方面可以稍微紓解無法取得中共作同類聲明的挫折感，另一方面中共若不作同樣的聲明，就必須擔起破壞和平的罪名。

在蔣同意發表公報後，杜勒斯私底下給蔣與國府官員空前的高評價，著實反映了他對公報滿意的程度。對臺北之行的成功，杜勒斯一方面當然歸功於自己的論點有說服力，¹⁸¹另一方面則盛讚蔣與其他國府官員通情理、好溝

¹⁷⁶ MC, Dulles with Makins, February 9, 1955, *FR1955-57*, 2:243-247.

¹⁷⁷ 艾登試探的經過可見張淑雅，〈安理會停火案〉，頁 98-99。

¹⁷⁸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頁 58。

¹⁷⁹ 直至 1971 年 6 月間季辛吉密訪大陸，大使級談判無疾而終爲止，雙方對此點還是未能達成協議；讓中共承諾不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也一直是美國談判的目標。

¹⁸⁰ 例如艾森豪於 1956 年 5 月 17 日致函蔣介石，指出「本人堅信，使用武力以解決共黨對中國大陸之控制，無俾於貴我兩國之最大利益。本人亦不認爲使用軍事力量係解救共黨奴役人民之適當手段。」艾森豪函中文譯本收在 412.4 蔣總統與艾森豪總統往來函件電報，外交部。

¹⁸¹ 杜勒斯剛回到華府向艾森豪報告時，認爲有關放棄使用武力，以及不要將自己的未來與「兩塊暴露（在敵火中）的地皮」掛鉤的論點說動了蔣：一週後向國家安全會議報告時，卻認爲蔣最能接受的是「分裂國家或有正式停火協定、或有放棄以武力統一的聲明」；他確信蔣已經完全認同「不以武力反攻」的做法。MC, Dulles with Eisenhower, October 24,

通。他先是在臺北私下向美國記者彙報會談成果時，大大地讚美了蔣介石，說他是歷史上的偉人之一，有超人的「信心、勇氣與決心」來面對逆境，局勢雖然很壞，他也沒有驚慌失措或失去理性，仍然與美國充分配合。在談判時，蔣也非常講理、可以溝通，因此他對與蔣的會談過程「極為滿意」。不幸的是世人卻多藐視蔣，認為他信用破產、被自己的人民所唾棄，這是不公平的。¹⁸²此外，杜勒斯也私下盛讚國府高層官員，指出副總統陳誠及其他參與會談的官員，都非常能幹、也很有個性；國府絕對不是蔣「個人獨裁」的政體，「自由中國政府在蔣去世後不會消失」。¹⁸³他在向國家安全會議報告臺北會談經過時，指出有關國府打算將美國牽扯入與中共的大戰以便「反攻大陸」一點，是完全錯誤的印象。他自信滿滿地宣稱：他確信蔣已經完全認同「不以武力反攻」的做法，也認為從此以後與蔣的問題會比從前容易處理得多。他還指出臺灣士氣高昂，臺灣人的經濟情況「空前的好」，因此他們基本上「非常滿足」；他也看不出臺灣人、外省人間有多大的歧異。¹⁸⁴對一向貶抑蔣與國府的華府高層來說，杜勒斯這樣的評價是國府遷臺以來所未見的。

取得了這樣的成果，杜勒斯在返回華府後，即將公報的「重點」向媒體與友邦大肆宣揚，希望凝聚國際間對國府做法的認同，以便向中共施壓，讓中共做出對等聲明，藉此穩定臺海局勢，同時讓中國加入其他分裂國家的行列，謀求和平統一。因華府刻意的宣傳與媒體的推波助瀾，公報的意涵產生與國府的理解完全不同的層面，對「反攻大陸」的政策產生長遠的影響。以下討論華府對公報的宣傳。

1958; MD at the 384th NSC Meeting, October 30, 1958; both in *FR1958-60*, 19:445, 470-471.

¹⁸² TOUS183 from Taipei to USIA,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 MF252.

¹⁸³ 見 Letter, Dulles to Sidney E. Smith (Canadian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27, 1958, 793.00/10-27, RG 59, NA; Memo by Dulles, October 29, 1958, *FR1958-60*, 19: 469.

¹⁸⁴ MD at the 384th NSC Meeting, October 30, 1958, *FR1958-60*, 19:471-472.

(三)「放棄使用武力反攻」的宣傳

無論國府或華府如何看待公報的內容，一向密切注意美國對「反攻大陸」政策的媒體，在看到公報後，自然有自己的解讀。因此公報一發表，記者們的目光只集中在反攻大陸「非憑藉武力」一點上。報紙，尤其是美國與西方的報紙，紛紛以蔣決定「放棄對大陸使用武力」為標題。¹⁸⁵東京的《每日新聞》甚至說國府在「放棄使用武力」解放大陸後，等於自己承認臺灣的地位是一個「地方性政權」，並稱此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以來最大之政策改變」，對中國問題與國際政治均有極大影響。¹⁸⁶

這種對「主要不是憑藉武力」與「放棄使用武力」的解釋歧異，有部分是因為中、英文公報用詞不完全相同所造成。公報中文本用詞為「而非憑藉武力」，翻譯成英文為“and not reliance upon armed force”，但英文本用詞卻是“and not the use of force”，直譯成中文為「而非使用武力」。另一個因為用詞而引起解釋歧異的部分為「美國確認中華民國為自由的中國(Free China)之真正代表」，括號內為英文本用詞 Free 一字第一個字母大寫，變成專有名詞，故翻成中文應為「自由中國」，而非「自由的中國」。這點新聞記者看出來，故指稱公報說國府是「自由中國的代言人、中國人民的希望」，看起來像是「兩個中國」的聲明。¹⁸⁷中共也藉此大作文章。故一週後，外交部寫信給美國大使，指出由於公報倉促發出，未注意到大小寫問題，請美國糾正；至於「使用武力」部分的原意，也希望美國能出面澄清。¹⁸⁸

¹⁸⁵ 美國各報對公報的標題與評論，可見收在外交部「412 蔣總統杜勒斯臺北會談」卷內的央密參（即中央社祕密參考消息），為該社由美、歐各地發回的輿論摘要。有關此點，在臺北的美國記者甚至問杜勒斯國府是不是「自願」聲明「放棄使用武力」的？見 TOUS183 from Taipei to USIA,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 MF252。杜勒斯一回到美國，記者也追問他蔣「放棄使用武力」的細節，見 Statement by Dulles at the Andrews Air Force Base, October 24, 1958, f: Chiang Kai-shek, box 127, JFDP, ML。

¹⁸⁶ 央密參(47)第 1720 號，民國 47 年 10 月 25 日，019.2 臺灣海峽（五），外交部。

¹⁸⁷ TOUS183 from Taipei to USIA,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 MF252。

¹⁸⁸ Tel.689 from Taipei, October 29, 1958, FR1958-60, 19:461-462; Desp.206 from Taipei, re: Chinese Position Language of the October Sino-US Joint Communique, October 30, 1958, encl. 1 Letter, Huang to Drumright, October 28, 1958, 793.00/10-3058, RG 59, NA。

杜勒斯與勞勃森商量，認為正式回信再加以公開，會凸顯雙方的歧見，反而削弱公報的效果。故國務院不僅勸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蔣夫人與葉公超大使在對華僑解釋公報時，不要說出有損公報權威性的話，也指示莊萊德僅以口頭回答國府，說美方同意國府對信函中所提兩點的解釋：即此後將公報中“Free China”改為“free China”；也同意說公報顯示國府在任何情況下均放棄使用武力是錯解，公報只顯示國府不會主動挑起戰事。¹⁸⁹儘管如此，美國官方聲明在提到自由中國時，仍用大寫的“Free China”。艾森豪當時寫信給蔣，也說很高興「自由中國(Free China)」能有蔣這麼「有經驗、有智慧，並且可靠」的領導。¹⁹⁰到 1996 年美國外交文件選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在印出公報全文時，仍舊印為“Free China”，¹⁹¹媒體報導也繼續沿用。「自由中國」變成與「共黨中國」或「紅色中國」相對應的專有名詞，所造成的「兩個中國」或國府「放棄使用武力反攻」的印象很難挽回。¹⁹²

除了公報中、英文用詞所產生的問題外，杜勒斯還刻意向記者強調「不憑藉武力」是國府的「新政策」，也是公報的「重點」。杜勒斯第一次對新聞界解釋公報意涵，是在離臺前私下與美國記者們的會談中。該會談雖然是

¹⁸⁹ TC, Dulles with Robertson, October 30, 1958, f: Aug.1 1958-Oct. 31 1958 (1), box 9, TCS, JFDP, DDEL; Tel.400 to Taipei, same date, *FR1958-60*, 19: 475-476.

¹⁹⁰ Message (Tel.384 to Taipei), Eisenhower to Chiang Kai-shek, October 24, 1958, 793.00/10-2458, RG 59, NA.

¹⁹¹ Joint Communiqué,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 443.

¹⁹² 其實早在此之前，「自由中國(Free China)」早就變成一個專有名詞，在此名詞被記者炒作之前，連蔣介石自己都將「自由中國」當作一個名詞使用，例見蔣介石，〈反攻戰爭是弔民伐罪的革命戰爭〉（民國 47 年 2 月 10 日）及〈重申反攻復國的信心〉（民國 47 年 5 月 25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9，頁 93, 110。不過國民黨在 1957 年初，即已下令其宣傳系統對外強調，國際間雖習稱臺灣為「自由中國」，但此稱呼緣起於二次大戰期間被德國滅亡各國的稱謂，中華民國仍保有臺澎金馬基地，也贏得大陸、海外同胞的歸心，因此不能以「自由中國」代替「中華民國」的國號。見《宣傳週報》，9:8（民國 46 年 2 月 22 日），頁 3。有些美國人，例如藍欽大使，在使用這個名詞時雖然與「紅色中國(Red China)」對應，但卻是正面意義，並非特意要用此為「兩個中國」張本。例見 Letter, Rankin to H.A. Smith, June 13, 1957, f: Formosa-Far East File (1953-58), box 118, Smith Papers, ML。藍欽提倡宣傳「自由中國」為「民主櫥窗」的努力，見張淑雅，〈藍欽大使與一九五〇年代的美國對臺政策〉，頁 206-207。

背景說明性質，內容不應刊登，但杜勒斯的話對記者們解讀公報，應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在會中除說明中共分化國府與美國的意圖適得其反之外，還強調公報最重要的是第六段，即反攻主要「不憑藉武力」一點。他指出許多國家認為國府打算掀起世界大戰以便返回大陸，故視國府為和平的威脅，這段不以武力達成光復大陸使命的聲明，讓國府加入其他分裂國家或接受停火協議、或宣稱不以武力統一國家的行列。¹⁹³當杜勒斯從臺北回到美國機場時，記者問他蔣是否同意金馬減防，他說那只是細節，會談討論了更「根本」的問題，發表在公報中。¹⁹⁴杜勒斯回到華府見過艾森豪後，隨即發表訪臺聲明，強調經過親身觀察，他深信國府很謹慎、堅具決心，且致力於和平；國府是「中國受尊敬之悠久文化與精神價值的真正監護人與維護者」，其不只注重軍事防衛，而是打算以「和平的方法」恢復全中國的自由，「完成其為中國的願望與傳統的發言人的崇高任務」。¹⁹⁵幾天後，他在返回華府的第一次記者會中，更是強調國府作此「新的公開聲明」，實具有重大意義，因其施政重點將隨著改變，將他們的使命置於長遠基礎之上。¹⁹⁶

華府這樣的宣傳角度讓國府很不滿，也增添了華僑與臺灣內部對公報的批評。葉公超因此向勞勃森抱怨：國府不喜歡美國強調公報代表其政策的「重新調整」。但勞勃森說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公報看起來確實是對國府政策「新鮮、公開」的陳述，有別於蔣一再重述的「今年是反攻年」。葉公超只好感嘆無法控制報紙的標題，所以常常是報導內容正確，但標題被扭曲了；這點勞勃森非常同意。而媒體的扭曲，也造成勸蔣接受公報的葉公超在臺灣飽受

¹⁹³ TOUS183 from Taipei to USIA,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 MF252.

¹⁹⁴ Statement at the Andrews Air Force Base, October 24, 1958, f: Chiang Kai-shek 1958, box 127, JFDP, ML.

¹⁹⁵ Dulles' Statement for the Trip to Taipei, October 24, 195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0, 1958): 722-723. 中文譯本見《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10 月 25 日，1 版。但《中央日報》卻並未重視「和平」與「文化」層面，而以「杜勒斯謁艾森豪後發表聲明：共匪軍事宣傳詭計，均無法達到其目標；中國政府、三軍、人民均深具決心，遠東自由國家皆認匪是致命危險」為此篇報導的標題。

¹⁹⁶ Secretary Dulles' News Conference of October 2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7, 1958): 770. 中文譯本見《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10 月 30 日，2 版。

抨擊。¹⁹⁷故葉公超在返美前，激動地向記者說「沒有一個國家保有軍隊，而又『放棄使用武力』的」，大陸發生大規模革命或中共進攻臺灣時，「我們當然要使用武力」；但是國府並未向美國保證只有在某種特定情況下才使用武力，公報的重點在強調「政治基礎」，亦即「大陸人心向我」在「光復大陸工作中的重要性」，而實行三民主義，是爭取大陸民心、對抗共產主義的有效方法。¹⁹⁸只是無論國府官員如何聲嘶力竭地解釋，報紙報導仍舊以「放棄使用武力」為公報的焦點、國府的新政策。

除了向媒體解釋公報的用意外，華府也不斷地向盟邦闡釋公報的「重大成就」，希望藉此引導國際輿論支持國府，並向中共施壓。杜勒斯一回到華府，就寫信給英國外相洛伊(Selwyn Lloyd)，報告他的「戰果」。他指出中共似乎打算把金門當作犧牲品，只要美國介入或國府行動不合意，就拿來鞭打一番，看是否能擊垮國府的士氣或自制力。雖然處境如此惡劣，國府還是同意發表不憑藉武力達成其神聖使命的公報。杜勒斯認為國府會盡力維持臺海的和平，並逐漸減少外島部隊。相反的，中共顯然不願臺海局勢平靜下來，故在外島大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以達到攫取臺灣的目標。因此他建議應該凝聚世界輿論的壓力，讓中共停止軍事行動。杜勒斯相信他與蔣所談有關「自由中國」神聖使命的部分，「將來會證明是國府重新大幅調整其政策的開始」。¹⁹⁹他也寫信給加拿大外長史密斯(Sidney E. Smith)，強調他與蔣會談最重要的結果，是讓國府公開接受其使命的「新觀念」：即一方面維持「自由中國」的價值，另一方面則「排除以武力對付大陸」。此信的基調還是讚美國府官員識大體，同時譴責中共繼續武裝騷擾，不放棄武力，志在臺灣，策略則先分化華府與國府。²⁰⁰他又致函紐西蘭總理納許(Walter Nash)與法國外長莫維(Couve de Murville)，聲稱對訪臺結果「非常滿意(most

¹⁹⁷ MC, Robertson with Yeh, re: Reaction to GRC-United States Joint Communiqué of October 23, October 29, 1958, *FR1958-60*, 19: 464-466.

¹⁹⁸ 葉公超離臺返美前記者會，民國 47 年 10 月 27 日，見《中央日報》，民國 47 年 10 月 28 日，頭版頭條。

¹⁹⁹ Letter, Dulles to Lloyd, October 24, 1958, *FR1958-60*, 19: 449-451.

²⁰⁰ Letter, Dulles to Smith, October 27, 1958, 793.00/10-2758, RG 59, NA.

satisfactory)」，因為說服國府高層對其國家使命採取新的觀念，國府藉此將自己置於與西德、南韓、南越等分裂國家一般的地位，而中共不但沒有對應的行動，反而持續其對外島的軍事壓力與騷擾。²⁰¹

除以杜勒斯致各國外長、總理的私函外，遠東助理國務卿勞勃森也與各國駐美大使談話，指出〈中美聯合公報〉最重要的部分，是國府公開說明其使命的完成是靠「實行三民主義，而不是憑藉武力」。²⁰²除了高層說明外，國務院還指示各駐外單位向其駐在國政府強調〈中美聯合公報〉的重點，在國府宣稱完成其使命主要不是憑藉武力，此顯示國府想法有重大的轉變，從原先期望以武力迅速反攻大陸，變成較長期的期望在「共黨暴政」崩潰後，再完成國家的統一。而「作為中國文化與精神價值真正的維護與守衛者」，國府決定透過建立典範，而非憑藉軍事力量來完成讓大陸人民重獲自由的使命。國府如此宣示，與其他被共產主義分裂的國家類似（或正式停戰、或宣稱不以武力統一），只要中共採取同樣的政策，臺海局勢實質上就會穩定下來。但中共顯然希望內戰持續下去，因此各國應該強力向中共施壓，以停止其軍事行動。²⁰³在對友邦宣傳的宣傳上，勞勃森與其他國務院的人謹守公報的用詞，提出「實踐三民主義」，杜勒斯則強調國府的「新觀念」。

對盟邦的解釋顯然起了點作用，例如加拿大總理狄芬貝克(John G. Diefenbaker)告訴杜勒斯覺得公報很具建設性，他本來認為國府企圖挑起戰

²⁰¹ Letters, Dulles to Nash and Letter, Dulles to Murville, October 30, 1958, 793.00/10-3058, RG 59, NA.

²⁰² 例見 MC, Robertson with Australian Ambassador Howar Beale et al., re: Taiwan Straits, October 24, 1958, 793.00/10-2458, RG 59, NA; MC, Robertson with New Zealand Chargé, October 27, 1958, 793.00/10-2758, RG 59, NA.

²⁰³ Circular Tel.501 to Chiefs of Mission, October 25, 1958, *FR1958-60*, 19: 451-452. 在給駐共黨國家的使節電報上，國務院去掉了「共黨暴政崩潰後」、「被共產主義」分裂的國家，以及「中共明顯希望內戰持續」等字眼，希望這些共黨國家能說服中共停止軍事行動，若無法改變這些共黨國家的政策，至少可以挑起強硬派與溫和派的辯論，並讓共黨國家人民注意蘇聯倡言和平之際，卻支持其他國家以武力達成其目的。見 Tel.709 to Moscow, Belgrade, Bucharest, Prague, Warsaw, October 31, 1958, *ibid.*, 19: MF267.

爭、將美國與全世界捲入，現在安心多了。²⁰⁴不過，盟邦也有不那麼信服的，英國尤其懷疑公報對國府的約束力，也認為杜勒斯沒有達到撤離外島的目的，非常可惜。²⁰⁵整體看來，杜勒斯的邏輯似乎有些天真，他認為國府既然宣稱放棄使用武力，再來國際間就該聯合向中共施壓，讓其照辦。不過連英國駐淡水領事館人員都清楚指出：國府還是預計在大陸發生匈牙利式的暴動時使用武力，也認為這種暴動很快會發生。換句話說，國府並未打算「完全放棄使用武力」，因此英國外務省的人覺得應該撇清，不要自願幫美國向中共施壓。²⁰⁶英外相洛伊在回覆杜勒斯信函時，只同意杜勒斯對中共動機的推測，不反對該給中共施壓，但除反問杜勒斯有何具體想法外，並未承諾要幫美國向中共施壓。²⁰⁷10月30日洛伊在英國下議院的外交事務演講中，對公報中蔣不憑藉武力反攻一點，也未加著墨，讓杜勒斯相當失望。他因此再度致函洛伊，強調公報基本上將國府達成使命的觀念從使用武力轉變成「透過和平的行徑與模範」，只要中共有類似的回應，局勢馬上就可以緩和下來，只可惜中共似乎不願意緩和局勢。²⁰⁸

對美國有關公報的解釋，最不滿意的當然是國府。公報發表後，艾森豪寫信給蔣表示他對杜勒斯訪臺成果的「欣慰」。²⁰⁹蔣過了將近兩個禮拜才回信，在這段期間內，公報已經被渲染成是國府「放棄武力反攻」的宣言，這是蔣極力要澄清的部分。蔣指出「共黨」極力扭曲公報的意涵，國府決心「盡

²⁰⁴ MC, Dulles with Diefenbaker, October 28, 1958, f: Memos of Conversation-General-A through D (4), box 1, General Correspondence and Memoranda Series (GCMS), Dulles Papers, DDEL.

²⁰⁵ MC, Dulles with Caccia, re: Secretary's Talk with President Chiang in Taipei, October 25, 1958, f: October 18-31, 1958, box 10, JFDMC, RG 59, NA; Tel.2885 from British Embassy to the Foreign Office, October 25, 1958, FCN1193/508, FO371/133543, PRO.

²⁰⁶ Minute by Dalton, October 27, 1958, FCN1193/508, FO371/133543, PRO.

²⁰⁷ Letter, Lloyd to Dulles, October 28, 1958, *ibid.*, *FR1958-60*, 19:MF264.

²⁰⁸ Message from Dulles to Lloyd, October 31, 1958, f: October (3), box 16, JFD Chronological Series, JFDP, DDEL.

²⁰⁹ Message (Tel.384 to Taipei), Eisenhower to Chiang Kai-shek, October 24, 1958, 793.00/10-2458, RG 59, NA. 其實蔣所注重的是美方在「決策前」與國府協商，艾森豪則將重點放在蔣答應「合作」，兩人重點不同。

其所能儘早回復大陸人民的自由」，只是因其深信完成此項使命的基礎「根植於大陸的民心」，因此必須透過實行三民主義而不是憑藉武力來完成；但國府必須「透過各種可能的手段、採取各種可能的行動」來支援大陸的反共行動，以期早日恢復被奴役的大陸同胞的自由，他也深信「大陸反共革命爆發只是遲早的問題」。²¹⁰杜勒斯起草艾森豪的回函時，特別注意到蔣所宣稱的「將採各種手段與行動來支持反共行動」一點，認為不能讓蔣的信作為對公報的解釋與限制。²¹¹因此艾森豪的回信基本上是恩威並施，先強調各國對公報都非常讚賞，因為中、美兩國表現出維持「和平與自由」的決心，更凸顯了共黨使用武力、危害和平。接著說他假設蔣信函中所說的「手段與行動」不會與公報及其他中美雙方的協議有所衝突。最後則指出中、美聯盟經此危機更加緊密堅強，此點將會維持在中國與其他地方掙扎想要重獲自由的人們的希望。²¹²簡而言之，美方認為公報既然已經達到美國要求國府「爭取國際輿論支持」的目的，當然無意將國府的實際打算公開澄清，國府只能接受這個結果。

五、結論

經過兩次臺海危機的衝擊，在美國打算降低外島重要性，甚至放棄金馬的策略下，華府決策者（尤其是杜勒斯與艾森豪）對於國府「反攻大陸」的政策，有了較深入的思考。在第一次危機中，華府發展出「待機反攻」的架構，要國府將自己轉變成「一股待機而動的力量」。當時美國雖然認為國府沒有反攻的能力，也不願支持武力反攻，卻不願放棄國府取代中共的可能性。但是經過第二次危機，美國為了拆解「外島」這個火藥庫，加上認定武

²¹⁰ Letter, Chiang to Eisenhower, November 5, 1958, f: Formosa (China) 1958-1961 (2), box 10, International Series, WF, DDEL.

²¹¹ TC, Dulles with Herter, November 13, 1958, f: CAHTC 10/1-58-12/31/58 (1), box 11, Christian A. Herter Papers (CAHP), DDEL.

²¹² Message (Tel.424 to Taipei), Eisenhower to Chiang, November 17, 1958, f: Formosa (China) 1958-1961 (2), box 10, International Series, WF, DDEL.

力反攻機會渺茫，所以轉而強調「精神反攻」，要國府扮演「中華傳統文化與精神價值的守衛者」的角色，「以行為與模範，而非使用武力」來讓大陸人民重獲自由。²¹³在國府同意發表反攻基地在大陸人心，主要反攻的途徑是實行「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的聲明後，「反攻大陸」雖然沒有馬上「精神化」，卻逐漸走上這條不歸路。無論國府如何不喜、不願，或辯解，杜勒斯仍舊判斷國府發表的是個「自我否定的宣言」，²¹⁴美國也透過向媒體與世界各國的宣傳，並持續要求國府加強其「文化中國」的形象，²¹⁵讓這種「自我否定」難以扭轉。杜勒斯因此可以預言「這個重大轉變將來的運用(空間)會很大」，²¹⁶因為公報表示國府重行定義其任務為「以保存中國文化與精神價值，來滋養大陸上反共精神」，²¹⁷這點「將來會證明是國府重新大幅調整其政策的開始。」²¹⁸

杜勒斯所預期的「將來」雖然沒有馬上發生，但終究發生了。八二三砲戰後，或許是為了消彌因公報而引發對其「放棄反攻」的批評，國府反而更積極地準備反攻。1960年代初期，連年的政治運動與天災造成中共內部飢荒與難民潮，加上越戰擴大，國府屢屢認為「反攻時機」已經來臨，蔣介石呼籲要以「軍事反攻與大陸革命抗暴相互結合」，²¹⁹並請求美國支持反攻，

²¹³ 此兩點為華府對新聞界與國際的宣傳重點，尤其是「以行為與模範，而非使用武力」的說法，原是美方公報草稿上的用詞，國府未接受，美方卻在宣傳中強調。例見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 of Dulles's Statement, October 24, 1958, f: Chiang Kai-shek 1958, box 127, JFDP, ML: Cir.501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25, 1958, 793.00/10-2558, RG 59, NA.

²¹⁴ Memo by Dulles, October 29, 1958, *FR1958-60*, 19: 225.

²¹⁵ 趙綺娜的研究指出「從 1959 年到 1963 年，駐華大使館每年的教育、文化活動報告，都特別提到要加強中華民國是傳統中國文化及現代中國文明之代表的形象。」見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卷 31 期 1 (民國 90 年 3 月)，頁 109。

²¹⁶ Dulte 7, Dulles to Eisenhower,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444.

²¹⁷ MC, Dulles with Ambassador Caccia, October 25, 1958, f: October 18-31, 1958, box 10, JFDMC, RG 59, NA.

²¹⁸ Letter, Dulles to Lloyd, October 24, 1958, *FR1958-60*, 19: 450.

²¹⁹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3，頁 313。

卻連續被甘乃迪(John F. Kennedy)與詹森(Lyndon B. Johnson)政府拒絕。²²⁰ 1960年代中期後，國府不但軍事反攻希望日趨渺茫，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承認中共後，國府在國際上與聯合國內代表「中國」的正當性也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適巧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因此蔣介石在1966年11月12日紀念孫逸仙先生101歲誕辰時發表演說，指出孫逸仙先生繼承道統、發明三民主義，使中華文化歷久彌新。與會全體聯名建議政府訂定孫逸仙先生誕辰為「中華文化復興節」，這是國府積極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開始。此後發展正如杜勒斯1958年所建議的，國府透過這樣的運動強調其「中華傳統文化與精神價值的守衛者」的角色，以與「毛匪毀滅文化的作為，針鋒相對」，²²¹努力維持其作為代表「中國」的「正當性」。²²²火藥味濃厚的「反攻大陸」口號，也在1960年代逐漸轉換成較溫和的「光復大陸」，到1970年代以後採用的是更溫和的「反共復國」，至此「反攻大陸」似乎真的「精神化」了。

至於藉著實行「三民主義」反攻，在1970年代轉換成強調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²²³到1980年代則正式變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

²²⁰ 王景弘，《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臺灣》（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第五、六兩章對1960年代國府請求美國協助反攻的計畫有較詳細討論。陶涵，《蔣經國傳》第十五章：翁台生、孫揚明，〈1962反攻大陸，差一點〉，《聯合報》（民國83年12月23日，39版），以及傅建中，〈美國務院外交關係文件揭露——「火炬五號」反攻大陸計劃〉，《中國時報》（民國87年8月23日，14版）等則有簡單的摘要。詹森的國務卿魯斯克在與蔣談到反攻大陸時，仍舊維持華府一貫地曖昧態度，即認為國府只能在外力協助下反攻，且一定要用核武，導致北半球的毀滅。當蔣強調無意以核武解決中國問題或要求美國協助即刻反攻時，魯斯克又強調中美必須密切合作以免錯失可能造成改變的良機。見 MC, Chiang, Rusk, et al., re: U.S. and GRC Policies in East Asia, April 16, 1964, *FR1964-68*, 30: 43-44.

²²¹ 〈國父誕辰暨文化復興節紀念大會致詞〉，民國56年11月12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9，頁69。

²²² 1991年3月28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業務結束，正式改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告一段落。運動的內容，可參見施志輝，〈「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4年6月）。

²²³ 蔣介石說：「第三期國民革命的目的，尤其是要在革命復國再北伐的聖戰之中，同時進行三民主義再統一的大建設。」見蔣介石，〈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4，頁301。

1981年3月29日，國民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決策，以下四年是這個口號的「黃金時代」。²²⁴蔣經國去世後，這個口號日漸式微，不過仍保留在面對廈門的小金門大看板上，與對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看板相互輝映。國府這些政策的變動，儘管在1958年10月23日簽訂〈中美聯合公報〉時並未預料到，看起來卻像是一步步落實了公報的內涵。國府走上「文化中國」、「精神反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路，當然是蔣在宣稱「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時所始料未及的。國府對此從抗拒到接受到利用，或許只是形勢逼人強故不得不，但過程細節也只能留待以後國府決策過程的檔案開放後，再來討論。

不過，如果因為國府在公報發表後的幾十年間，終於走了看起來像是杜勒斯設計的路，而認為杜勒斯是神機妙算的大策略家，那也未免太高估他了。從前面的討論中，可以看出杜勒斯過度渲染他訪臺說服蔣放棄武力的功績，蔣介石願意發表「不憑藉武力反攻」的公報，是因國府早就發表過類似的聲明，並不是杜勒斯的理論有說服力。從決策過程的討論與文件草稿看起來，杜勒斯與其他決策者都是從自己的偏見（即認為國府防守外島是為了反攻）出發，演繹出一套說詞，卻歪打正著，讓杜勒斯有誇耀的機會，而後順水推舟、循線宣傳，逼得國府走向「文化中國」與「精神反攻」的路。其實杜勒斯在構思對國府的說詞時，除了不讓中共取得臺澎的「底線」外，對臺灣的前途（臺灣獨立、聯合國託管）並沒有清楚的設計，他固然覺得「兩個中國」是自然的趨勢，美國無法反抗或強迫走這條路，卻不覺得美國該「鼓勵」走「兩個中國」的方向。²²⁵

²²⁴ 看當年各報章雜誌對此熱烈討論，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同盟」，又開研討會討論為何三民主義才能統一中國、如何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等，並結集成多本論文集出版。例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偉大的舵手——蔣總統經國先生專輯》（臺北：中華民國歷史文化出版社，民國72年）；林桂圃主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集》（臺北：東方文物出版社，民國70年）；時事周報社編印，《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臺北：該社，民國70年）等。

²²⁵ MC, Dulles with Casey, re: Taiwan Straits, October 13, 1958, f: October 9-17, 1958, box 10, JFDMC, RG 59, NA.

杜勒斯對國府重返大陸可能性的矛盾估計，最能反映這種沒有清楚規劃的狀況。他一方面認為國府反攻絕無希望，另一方面，雖然對國府可以反攻「時機」的定義越來越嚴苛，卻從未放棄「待機反攻」的想法。²²⁶公報發表後，記者問國府是否已經改變反攻大陸的政策時，杜勒斯說他不認為國府會在大陸沒有內亂的情況下反攻，但根據過去三年東德、匈牙利與波蘭發生的抗暴，顯示類似的情形可能在中國大陸重演，只不過時間無法準確預測。一旦發生抗暴，有支持武力在旁會產生很大的鼓舞。²²⁷他也說「美國不接受中共政權會永久存在，他不知道這個政權什麼時候會改變，但毫不懷疑它一定會變。」因為中共似乎打算把全體人民變成奴隸，如此只會招來強烈的反抗。²²⁸他在1958年10月10日與軍方開會時，還預測大陸可能十年內就會發生「匈牙利式」的抗暴。²²⁹另一方面，他早在1955年時就認為除非很快反攻，流亡政府「不可能重掌政權」；而經過一段時間後，就算當地政權發生危機，反對者也會在國內找尋領袖，不會轉向流亡政府。²³⁰到1958年10月12日，他也告訴參議員格林(Theodore F. Green)，臺灣人在國府與國軍中的影響力將逐漸增加，到時「臺灣人的政府」對於返回大陸會較不感興趣。²³¹第二天，杜勒斯又告訴澳洲外長凱西(Richard G. Casey)，五年之後大部分「臺灣居民」都會希望臺灣被視為一個獨立國家，就算外省人也會對臺灣發

²²⁶ 美國認為可以反攻的「時機」，從1955年的中共內部分裂叛亂，或對外侵略擴大衝突時，一直到公報發表時，認為需要有大規模的中共軍將領有大規模不滿、協助叛亂時，條件可說越來越嚴苛。例見 Statement by Dulles, April 8, 1955, *FR1955-57*, 2:455-463; Preliminary Draft of Possible Statement of Position for Communicatio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pril 7, 1955, f: Position Paper on Offshore Islands 1955 (4), box 2, White House Memorandum Series (WHMS), JFDP, DDEL; Draft Talking Paper by Dulles, October 13, 1958, *FR1958-60*, 19:399; REAT MC-10a, Statement by Dulles left for Chiang Kai-shek, October 22, 1958; both in *FR1957-60*, 19: 421-423.

²²⁷ TOUS183 from Taipei to USIA, October 23, 1958, *FR1958-60*, 19: MF252.

²²⁸ Memo by Dulles, October 29, 1958, *FR1958-60*, 19:469.

²²⁹ MC, Dulles with DOD-CIA, October 10, 1958, *FR1958-60*, 19: 363-371.

²³⁰ Tel.273, British Embassy to the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9, 1955, FO371/115029, FC1041/185, PRO.

²³¹ MC, Dulles with Green, October 12, 1958, *FR1958-60*, 19: 377

展比對「反攻大陸」有興趣。²³²

杜勒斯並未看到他這些想法間的矛盾，也未思索國府應該怎麼做，才能符合他的期望。基本上，美國不想付出大代價來解決中國或臺灣問題，所以也沒去想清楚政策的方向。或許保有行動彈性的「機會主義」，才是美國所有冷戰策略的基礎。曾在杜勒斯手下當過政策規劃司長的鮑威，日後在專書中指出，艾森豪曾說過「或許要捲回鐵幕的時機還很遙遠，但我們應注意所有的機會，並準備及早削弱蘇聯力量的計畫。」故冷戰中，行動連絡局(Operation Coordination Board)持續構思如何削弱蘇聯影響，中情局、美國之音等單位則持續以宣傳與地下行動來利用蘇聯的弱點。²³³換句話說，艾森豪政府的冷戰策略表面上看起來是積極的「捲回鐵幕」，執行上則是消極的「機會主義」，在儘量避免與共黨集團正面衝突的原則下，等待可以趁虛而入的機會。美國在 1950 年代兩次臺海危機間對國府「反攻大陸」國策的想法，完全符合這種原則。十多年後，蔣介石揣摩盟邦對「反攻大陸」的複雜心理，認為「一般強權國家，也不是不知道只有我們反攻大陸，徹底消滅了毛共匪幫之後，亞洲——以至於整個世界人類，才有和平底定之可言，但是他們打從心底裏起，一方面固然不願予共匪以可乘之機，一方面又顧慮我們力量弱小，不能戰勝匪共，深恐牽累他們，所以他們也許未嘗不希望我們的反攻復國行動早日實現，卻又怕我們引起世界戰爭，因此還是要反對我們光復大陸的討逆行動。」²³⁴這樣的看法多少抓到了美國對國府「反攻大陸」政策看法的實際面與矛盾的心態。

²³² MC, Dulles with Casey, re: Taiwan Straits, October 13, 1958, f: October 9-17, 1958, box 10, JFDMC, RG 59, NA.

²³³ 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1.

²³⁴ 蔣介石，〈科學的道理續篇——科學的行政管理方法、和革命工作企業化的精神〉，民國 58 年 2 月 24 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9，頁 296。